# 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于润 著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以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为人知的温馨怀想　助人度己的人生桥梁



## 作者简介

**茅于润** 著名音乐家，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幼子。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员(1948—1978)；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1978—1988)；美国杨伯翰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1988—1991)。

（茅以升）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

——毛泽东

他在建桥过程中，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在急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大事。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茅老的学生和助手，对他那种学识渊博而又虚怀若谷的一代大师的高尚品德，我将永志不忘。

——卢肇钧（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分科学会理事长）

诗人常把天上的彩虹喻为人间的桥梁，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化作了彩虹，永留在人间。

——茅玉麟（茅以升女儿，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科技馆副研究馆员）

ISBN 978-7-5339-3220-6




定价：15.00元

# 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于润 著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以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茅以升 / 茅于润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39-3220-6

Ⅰ.①我… Ⅱ.①茅… Ⅲ.①茅以升（1896—1989）—生平事迹 Ⅳ.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960 号

**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于润　著

责任编辑：柳明晔
装帧设计：一　知
责任出版：朱毅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00 千字
插页：1
印张：5.625
书号：ISBN 978-7-5339-3220-6
**定价：15.00 元**

##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张 鸣

跟所有的大人物一样，茅以升对我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过去的中国，是个革命的中国，但是，这个革命，却偏偏特别喜欢跟科学纠结。所以，只要科学家（包括工程学家）不是太不识抬举，还是会有点地位的。第一次知道茅以升的大名，是大约八岁或者九岁的辰光，那时候我刚刚会看没有画的书，很得意。其实当时看的也不过是些浅显的少儿读物，记得其中有一本是专门给少年儿童看的科学家的故事，书名我已经忘了，其中有个故事就是讲茅以升的。这个故事，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他造了钱塘江大桥。作为在北大荒出生的“浙江人”，对父母之乡的这条母亲河还是知道的。二是居然有人姓茅。当年我家在黑龙江垦区挪动了好些地方，从来没碰到过姓茅的小朋友。

这样的科学家故事，是很容易激励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科学家梦

的，可惜，其时已经临近“文革”。“文革”爆发后，十年之久，学校里无论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课都不甚了了。即使在1973年几个月的“回潮”里，课本还是薄得不像话，作为主课的数学，大抵上无非贫下中农为了学大寨，今天挖个圆形水塘，明天挖一个方形水塘，给出尺寸，让你算一下体积。学制改革后的九年制学校毕业，说是相当于过去的高中，大多数同学连勾股定理都不知道，连封信都写不了。所以，科学家的梦是不会有人做了，连我这样总是被拎出来整的“白专典型”，也无非是私下看了点禁书——那年月，什么都是禁书，连高尔基的《童年》都不健康。

但是，在这期间，我还有一次想起了茅以升这个名字。那是1974年，我因足疾回外婆家养病，某一天，一个人来到钱塘江边，在登上六和塔眺望钱江桥的时候，脑海里没有浮现当年为保卫钱江桥跟阶级敌人搏斗的英雄蔡永祥，却想起了茅以升。

“文革”后的中国，英雄淡出，茅以升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严格说应该是工程学家），再一次登上了社会荣誉的顶端，成为千千万万中小学生敬仰的楷模。红太阳走下神坛，但科学家却被抬上了圣山。这个曾经把科学家赶入牛棚的民族，乘着科学大会的东风，把自己的科学家捧成了奥林匹亚山上的阿波罗。当然，这期间，有关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传记，故事，电影，就很多了，拔高，在所难免。风气所被，连科学家的家人，回忆自家的大人物，也随之高耸入云。后来，虽然大家在说大人物的时候，多少人性化

了一点，但是依然有很多无形的清规戒律。比如说大人物舐犊可以，但情深就要打折扣，免得让人觉得他自私。

在我电脑里打开的文件中，有一个已经做爷爷的人回忆他父亲的文字。这样的清规，那里是没有的。可以说，这个人是幸运的，因为他偶然地变成了名人之后，茅以升的儿子，而且还是最小的儿子。“丈夫亦爱少子乎？”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赵太后之问，答案在中国，尤其是吴越两地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份不长的书稿，记录了一个儿子眼中的茅以升，不仅作为科学家，而且是作为父亲的茅以升。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是学习方法与众不同，一个杰出的工程学家，抓住了时代给予他不多的际遇，一个一尘不染的技术官员，一个能把枯燥的数学公式讲得妙趣横生的教授，一个能让被开除的学生心悦诚服的大学校长，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一个爱儿女的父亲，一个亲戚眼中好说话乐于助人的好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笔下，公众眼里伟大的茅以升也是个有缺点的凡人，至少，他是一个惯着、或者娇纵少子的慈父。作为小儿子的作者，小时候可以“横行霸道”，最好吃的，最好玩的，都有“优先权”，并不会因此而担心受到惩罚。酷爱音乐的他，很小就得到了满足，不仅可以得到特别的教育，而且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他提出要去美国留学，父亲就会千方百计地求人把他送出去。只是，这种在作者笔下有些夸张的“娇纵”，没有让他变成

一个纨绔。尽管没有成为他心目中的伟大音乐家，但仍然是一个国内稀缺的优秀音乐人，一个著名的教授。然而，这样背离父亲道路的选择，却让他进入了一个是非圈，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比父亲还多的折腾。可是，在“文革”中，被关入牛棚的他，只要看到报纸上还有父亲的名字，就坚信父亲肯定会把他救出去。其实，这种指望过后看来，有几分不靠谱，在那个顶着“科学院院长”头衔的人连自己心爱的儿子都保不住的年月，纵使茅以升的父爱有天大，如果有关部门真的要把作者怎样，他恐怕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大概也只有作为儿子，才能看到茅以升一些有“缺点”的生活细节，大概也只有作者，才能把它们写出来，不担心损害父亲的高大。我们看到，茅以升是个京剧迷，一个梅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梅兰芳的粉丝。在他看来，父亲喜欢的，就是梅兰芳的“扮女人”，比女人还女人的范儿。但是，酷爱京剧的父亲却坚决不肯让侄子学京剧拉京胡，理由是茅家人不能做戏子。但是作者学小提琴，却可以开绿灯。父亲是儿子第一个教师，虽然没有影响儿子子承父业，但父亲的一套吸烟有理的理论，却让儿子有了几十年的烟瘾，到晚年才在美国“恶劣的”禁烟环境下得以戒除。

有缺点的伟人，才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在作者的笔下，茅以升的缺点，还让人感到可爱。尽管作者尽量收着，不刻意去赞美他实在了不起的父亲，但字里行间，对父亲和母亲的爱，还是在往外

溢淌。一个无处不在的潜台词是，他得到父亲的爱实在太多太多，而作为儿子，无论怎样，都无法报答父爱以万一。

我们只能说，作为人子，有这样的父亲，真是三生有幸。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喜欢作者笔下的茅以升。喜欢一个溺爱少子的父亲，喜欢一个有着常人缺点的大人物。

说实在的，我是没有资格给这本过于“厚重”的书作序的，以上所说，只能算是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的读后感。

2011年3月1日，于北京清林苑



# 序

钱塘江波涛汹涌，自古就是天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唐代诗人卢纶描述渡江惊险时说：“飞沙卷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浪花湿。”

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钱塘江大桥建成以后方才改变。

在钱塘江上建桥非常困难。首先，大桥必受到涌潮的威胁。涌潮威力很大，我曾亲眼看着塘顶紧密砌筑的条石，三五成群地被涌潮掀起，越过近两米高的土埝，被抛到塘后一二十米远的田地上——这些石头每条都有四五百斤重！其次，基础条件差。几千年来，大量泥沙随着一天两次潮涨潮落来回搬运，形成了河床数十乃至上百米粉沙软土的淤积层，兴修任何建筑物都很难。

茅老在极艰苦的情况下，经历无数波折，克服重重困难，在钱塘江上建造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竣工之日，正值日寇嚣张之时，赶在日寇侵入前，撤走重要物资以后，茅老忍痛炸毁了刚刚建好的大桥，割断日寇尾追。茅老当时写了一首诗，悲愤地说：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终于，抗日战争胜利，茅老即亲自主持大桥的修复工程。同一个人，主持同一座大桥的建设、炸毁、修复，古今中外都极罕见。

茅老立下为国人永世不忘的功绩，成为我国工程界、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茅老与钱塘江的缘分不仅是大桥。

历经抗日战争，钱塘江海塘经久失修，破坏严重，千疮百孔，亟待修复，同时，钱塘江管理局工作停顿了八年，更待重启。

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1946），茅老来到钱塘江，重启钱塘江开发大业。茅老向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建议，聘请17位中外土木水利界知名人士为局顾问工程师，有侯家源、薛卓斌、张自立、杜德（Rolph A.Tudor）、怀德好施（A.O.Whitehouse）、康益（A.Corrit）等。旋经“省政府”报经当时的“行政院”批准，于1946年8月1日成立钱塘江海塘工程局（今钱塘江管理局的前身）。茅老和汪胡桢汪胡老被任命为正副局长。

茅老主持，组成顾问11人，“省府主席”沈鸿烈、建设厅长、

水利局长等人参加的考察团，于1946年8月11日至13日考察钱江北岸海宁、海盐海塘。嗣后，在上海康益的寓所讨论此行结果，决定再由各专家拟具意见书，汇编出版。此次考察认真细致，专家们提出了海塘设计及宏观和微观的诸多建议，为以后的海塘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茅老和汪胡老还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和省、地政府、商界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筹集经费，组织海塘堵缺、加固、抢修，顺利度过1946年到1948年的三年汛期，未酿大灾。

茅老不仅重视眼前的海塘除险加固，更关注江道的治理。1946年8月13日和8月15日《申报》两次报道茅老关于整理河道以为治本之策的方针。报道称："塘工局局长茅以升说，唯今之计，保滩重于修塘，治江重于保滩。治江须稳定河床，使流畅的江水归槽，最后能使江河变为狭而深，则江上可以通航，两边可以剩出土地开垦，……整治钱塘江要利用钱塘江的特性，因势利导，必能事半功倍。"

可惜当时战乱频繁，财力支绌，根本无法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近三十年，国力日盛，经过持续努力，建成了钱塘江两岸高标准的海塘，杭州到海盐原先游荡多变的江道已经缩窄稳定，同时，围垦了百余万亩土地，昔日江滩已经变成良田，开发区内工厂林立，实现了茅老当年的愿望，茅老在天有灵，定会含笑。

隔了半个多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钱塘江上的第二座大桥建成，如今建成、在建的已有十余座，杭州市已经成为繁华的

商城。杭州湾大桥还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1947年到钱塘江管理局工作，在茅老的教导下，开始了六十余年的治江生涯，他的道德文章影响了我一生。

1986年秋，我们专程晋京，拜谒茅老和汪胡老二位前辈，请二老为《钱塘江志》题名、题词。二老对钱塘江海塘修筑与江道治理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情况，耐心听取汇报。我一直珍藏着当时合影的照片。

三年前，在钱塘江管理局百年庆典上，听到茅老最宠爱的孙女为蕙演奏的钢琴曲。今又读到于润先生怀念茅老的文稿，恍若茅老又带着他那淡定从容幽默和蔼的笑容站在面前。

我想，茅老定然在看着钱塘江水，看钱塘江水带着他一生的辛劳、成功的喜悦、殷切的希望，永不停息地从钱塘江大桥的桥孔流过，从四桥、三桥、二桥流过，从依然屹立的海塘脚下流过，也从他预见的“世界上最长、最大、最现代化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流过，一直流到广阔的大海……

我想，茅老也会静静地倾听孙女的演奏，观看于润先生的文字，看到他们都那样热情、真诚和善良，一定很高兴，为他们能生活在这么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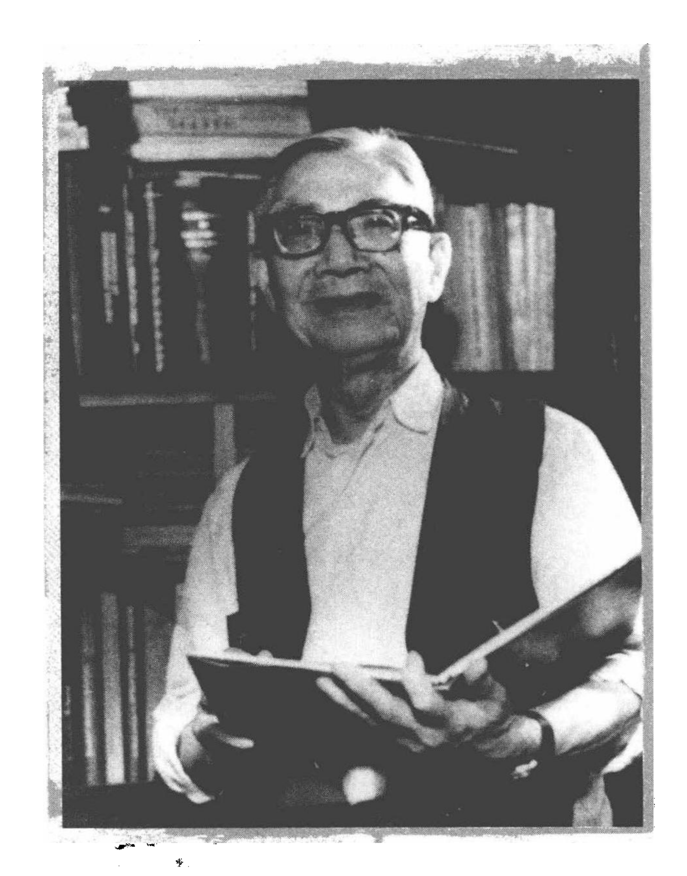
戴泽蘅

（曾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
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2011年3月

父亲茅以升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在这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回忆起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并用速记的方式记录在我的日记簿里。今撰述成文，作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茅于润



20世纪70年代于北京寓所书房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以升




钱塘江边茅以升铜像竣工揭幕典礼

# 前 言

我偶然地出身在一位名人父亲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

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在案，本无须我再画蛇添足、锦上添花。但前年11月17日是该桥建成的70周年，这个日子触动了我的心弦，促使我动手写出了这本薄在纸页、厚在亲情的小书。它叙述的，除了我对父亲的思念外，更主要的是父亲和“桥”有关的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是我们之间难以忘怀的父子情和剪不断的悠悠往事。

我不是作家，不是文学家，我是学音乐的，但未成“家”，什么“家”都不是，只是个文艺工作“者”。因幼时受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写文章最容易出名”影响，再加上我的中文水平尚

可，所以就喜欢动动笔杆子，不料后来居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使我得意忘形，再接再厉。回顾一生，“名”没有出，“祸”倒出了不少。

由于读的书有限，常不能把内心的真实思想在纸上或电脑上准确无误地化为物质外壳的文字符号，畅所欲言，因而深深地领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同时，我也无力写出父亲的“客观存在”，只能从我自己的主观去写我心目中的父亲，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

写文章贵在真实，贵在坦诚，去假去媚，不歌不颂，忠于自己的思想，忠于自己的观察。但每每我读到此类纪念性的文章，作者常把主人公写成个一尘不染、胸怀大志、有胆有识、力挽狂澜，有如“样板戏”里的英雄豪杰、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君子。只要他（她）一出场，登高一呼，就可扭转乾坤，改天换地，把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踹在脚下，或把它们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不仅如此，我们在歌颂名人、大人物的文字中，常见到他们被无节制地拔高，高得脱离了人类，脱离了地球，冲出大气层，高耸入云，与星辰为伍，与红太阳做伴，变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异类！

我曾经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中，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

免喷饭！

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或是家庭方面的，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以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当然也是"人"，他也和凡人一样地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也许有读者会问我："那么，您在这本书里写的有关令尊大人以及您自己的其人其事都是真实的吗？"我的坦白交代是："凡是我写出的，都是真实的；但我无意，也无能力，为他树碑立传。"

我们虽是父子，但由于长期以来生活两地，特别是解放以后，因政治运动，我常下农村、工厂，有时连书信、电话都常常互不相通达数年之久，对他一生的全过程知之不详。

但这本小书也有很多的地方不可避免地谈到我们之间共同的生活和交谈。我是父亲的产物，也就是父亲的"作品"。既然是作品，它必然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因此，谈到我自己，也就是为了间接地谈到他。

对我来说，父亲的"言教"是我幼儿时期的主要思想来源，他是我最深刻的思想影响者。他的许多教育子女的思想未必都是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他对我们无原则的宠爱，过分的民主，以及在学习、为人上都缺乏严格的要求，等等。

我们都不生活在真空之中，都离不开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社会，更不能把我们过去的生活从我的灵魂中切除。因此，我的笔也必然地会常常滑落到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去——特别是“触及人们灵魂的”，甚至是（我认为）“触及人们生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我有不少朋友在此运动中都被“触”得“畏罪自杀”！否则，我在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受到过“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如今，青山依旧在，夕阳几度红。钱塘江大桥的桥面上将不再出现父亲的踪影。为了纪念他修桥铺路、造福人民，人民在桥头上树立了他的铜像，与长流不息的钱塘江水相与辉映，受人仰慕。

几十年来，父亲的一生确是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在他的著作中也有记录：

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搭桥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人生乃一征途耳”手迹

#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1989年11月12日父亲在北京医院病逝。当天我就接到北京家人打来的电话，在第一时间感到的是：至此，我的双亲俱失，今后只能和我的爱妻二人孤军奋战地求生在这宇宙空间里的一颗小行星之上了！那时，我正在美国杨伯翰大学任教，不便请假。父亲晚年常住医院，自从1987年住院后他就没有再回过家。噩耗传来，我思想上虽有准备，但父子情深，悲痛自不待言。当时，我面临的重大难题是：我这位“孝子”（在中国的讣闻上，父亲或母亲过世后，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后代，也包括婴儿在内，无论孝与不孝，都一律冠上个“孝”字，所以，这个“孝”字用在这里，仅仅是一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毫无意义的多余符号，见者千万不必认真！）是否要回国参加他的“遗体

告别会”。

古语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其实，这个“几稀”重要得很，可贵得很。简单地说，人的这个“几稀”，就是他的改善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聪明才智，而禽兽则无。禽兽也本能地照顾自己的幼崽，但我不能肯定其中是否也包含着人类所具有的那种通过“思想”而产生的父子之情或母子之爱，更不必奢谈它们是否具有什么人类的高级智慧了。

人最可贵的，当然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躯体。一旦失去了生命，这个人类所独有的、释出“思想”的“脑”也就随之消亡。因此，如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仅从他们的遗体或骨灰本身的物质成分来看，人与禽兽完全相同，无此“几稀”之别。

在人类的生活中，凡遇重大事件如结婚、毕业、授奖、国家元首访问、入党、总统就职、洗礼、签订合同、晏驾、死人等等，各国均有不同的规范化的仪式或典礼来表示对当事人的庆贺、作证，或悼念。它们都已成为该国人民的习俗，无论合理与否，都无可厚非，应该尊重。但我本人只想对仍在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繁文缛节提出一些可能是离经叛道的看法：

在我国目前流行的丧礼仪式中，有一项叫做“遗体告别会”。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就不愿意让陌生人在不得到他（她）同意的情况下来打扰，而在死后却无可奈何地任人搬弄，任人摆布，任人抬入大厅，不由自主却又无可奈何地躺在那里被

迫“示众”。到会者除家人、好友外，还有一些是奉命来参加的人。他们对死者知之不详，甚至素未谋面，更无惜别、哀悼之意。他们好像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好奇、惧怕、刺激，去窥探一处不常见到的景象：一个被打扮得像蜡像馆里陈列的假活人。这实在有违死者的意愿，对死者不够尊重。所以，经过认真的考虑后，我决定不回国参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虽死犹生，我永远都不和他“告别”，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天，我在报上见到了有关他的丧事的文字报道，以及他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遗体照片——他在逝世前两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照片上，我见到他的真面目已被专业尸体化妆师化得年轻英俊，精神焕发，但面貌全非，判若两人。他已变成了一个家人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不再是我的父亲了！

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都在这天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纪念性的文章也随之蜂拥而至，对他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以及他一生的工作、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等都作了大同小异的报道与颂扬。父亲治丧委员会的“规格”也很高：由党的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各种委员、各种主席、各种书记、各种代表、各种长，以及各种社会名流等组成，可见父亲死后的极大哀荣。

父亲的丧礼也引起了我对几十年前我祖父丧事的回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祖父死后，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亲友们送

来的挽联非常多，无处展示，就在他家天井中用芦席搭了一个大棚，用以悬挂和陈列这些言不由衷的挽联和陈词滥调的颂歌。

吊丧那一天，远近亲属们都穿着不同“等级”的孝服，三朋四友，络绎不绝地结伴而来。他们的脸上好像都未见表现出什么哀容，小朋友们也跟来玩耍，四处奔跑，十分热闹，像是在过年，也像是出堂会。我这位“孝孙”那时年幼无知，不到十岁，平时和祖父不住一城，很少见面，也跟着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未有悼念、哀伤之意。

每逢来宾吊唁，到灵前对遗像跪拜，或鞠躬致礼时， 就有被请（即“租”）来的和尚数人，身穿袈裟，鱼贯而入，站立在祖父灵柩两侧，目不斜视，状至严肃。木鱼一响，诵经之声随之而起，此时我祖母房内的哭声也即应声大作，其中夹杂着陪伴她的亲友数人的助哭或陪哭之声，声中还透露出对祖父一生的含糊颂词。来宾退席后，哭声也立即随之消歇。此类和尚念经，伴哭之“闹剧”，一天要为吊唁者上演多次，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记得母亲曾告诉过我，那时还有以“卖哭”为职业的妇女，她们按时论价，按卖哭者的年老年少论价，按租用的人数多寡论价。为了赚钱，她们的“哭”也独具匠心：随身带着像菜单那样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悼词，由丧家根据死者的不同年龄、家属的不同要求来选用。

按惯例，祖父的棺材要在家里安放三年，不能急于下葬，表

示依依不舍。在此期间，他的亲人还要把他当做活人对待，每日都要去“寿材”前供奉香火、贡品和“食物”，全家人都要按节气赶来叩首跪拜。三年满期之后，把沉重的楠木灵柩抬上火车，由“未亡人”、“孝子”、“孝媳”、“孝女”、“孝婿”等人陪同，千里迢迢地运到家乡去“安葬”，“入土为安”。那时，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火葬”，把一个亲人放在火里焚烧！那真是天理所不容！

以上说了这么多，为的是想“揭露”父亲这位受西方文明洗礼的美国留学生对那时祖母以及我大伯父所赞同的这类封建式的丧事并无异议，还和他们“沆瀣一气”地积极操办。可见，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经建立，无论是否合理，都很难改变，我母亲的缠足也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即使父亲当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制止这种劳民伤财、毫无意义的丧礼，他的“先进”思想也一定不会得逞，反而会落得个“不孝子”的丑名，贻笑大方。

我来到美国后，未参加过美国华人的丧礼仪式，不知其详。但我仍常常在中文报纸上见到显示封建主义遗风的讣文，沿用至今。如果丈夫先“亡”，则其遗孀至今仍称自己为“未亡人”，好像丈夫死后，妻子就应该跟着一起去死，如尚未亡，就称自己是到目前为止尚“未亡”的“未亡人”！“未亡人”的后面跟着一大串标有“孝子、孝媳、孝女、孝婿、孝孙、孝孙媳、孝孙

女、孝孙婿、孝曾孙、孝曾孙媳、孝曾孙女、孝曾孙婿”等等称号的亲人。丈夫一死，好像他后面的晚辈亲人也都变得“孝”了起来。不仅“孝”起来，而且还大家一起——其中也包括才几岁的幼儿，甚至还有几个月的婴儿——“同泣启”！

如今，这类治丧仪式确是简化了不少，时间、人力、财力也都节约了不少，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这由真死人上台演出的“向遗体告别”一幕似也可从略。

光阴荏苒，如今，父亲逝世已20年了。在这20年里，他的欢声笑语、举止言行并未因久别而从我心中淡去。我几乎每天都想到他，特别是在我生活中遇到成功或失败时，他总是我立即想到的、愿与分享喜悦与悲伤的第一人。

父亲不仅仅是生我育我的男子，而且是最值得我纪念的“良师”、“益友”和“楷模”。过去，无论我这宝贝儿子遇到何种困难，提出何种要求，他都会鼎力相助，有求必应。因此，他也成了我生活中最可信赖的第二“大救星”。特别是十年“文革”对我日新月异的长期的批判斗争中，只要他的大名未从报纸上的“人大常委会”的名单中消失，我就在“牛棚”[1]中看到了希望，在隔离室里见到了光明。那时，我坚信，他一定会来“救”我的！他的存在增强了我的生活勇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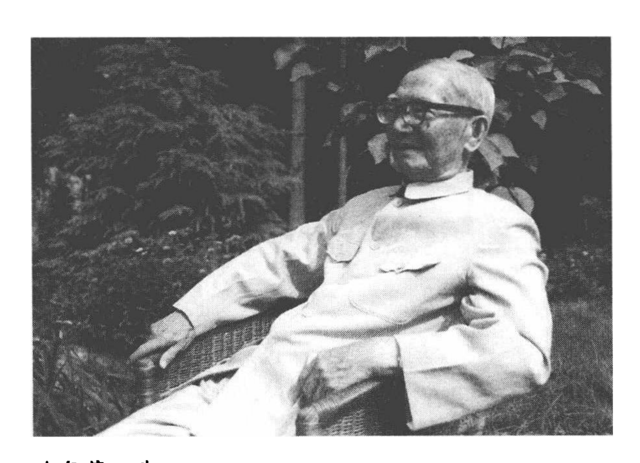
①当时被审查的各类“反动分子”聚集的一间房。

中国人有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我们父与子的一生遭遇、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千差万别，但我们的主导思想常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所以，反过来看，有其子当然也就必有其父，从其子身上也可见到其父的身影。

写这本书，我和父亲又从头在一起生活了一遍，也必然会忆起我们之间几十年来的悠悠往事，它们仍然历历在目，仍然刻骨铭心。

但自我出生、懂事的几十年以来，我和父亲之间的"交往"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以及不原谅他生活上的诸多缺点，也曾和他有过不少的激烈争论和沉默的对抗。如今生死两茫茫，求恕无门， 每念及此，常怆然涕下。

未经化妆的，面不改色的，从中年到老年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是爱他的真诚儿子，不是他的"泣血顿首"的虚假"孝子"。



晚年茅以升

# 名列前茅的秘密

##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

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

了硕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还创造了“茅氏定律”。[①]那时，他年仅24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所需的时间定出合理的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目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结束，也不延长，留诸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课，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父母生了我们六个子女，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我们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我看，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

---

① 茅氏定律：1919年10月，茅以升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完成，全文共三十多万字，引起美国土木工程界的强烈反响，其中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被称为“茅氏定律”。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虚度了许许多多的大好时光！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我希望莘莘学子看了这篇短文后，以家父的治学方法为师；以我依赖父亲，过分强调与生俱来的天赋，缺乏排除万难的刻苦学习精神而未能功成名就为前车之鉴。



竖立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园内的铜像。旁立者是茅以升二女。

# 一生的热爱

## 造桥——与工人共命运

父亲是1916年庚子赔款资助的留美学生，在美国学的是桥梁专业。1919年回国后，于1933年应当时杭州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之召，辞去北洋大学校长之职，赴杭州筹建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曾养甫是竭力主张并筹款建造此桥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他的倡导，没有他的筹款，就没有钱塘江大桥。但在建桥的史料中很少见到他的大名，所以特在此处一提。

对父亲来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产生了爱桥的情结。他曾经告诉过我们，他幼年在南京时见到秦淮河上一座小桥，名文德桥。端午节秦淮河上赛龙舟，只见桥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忽然有人大喊："桥坍塌了，有人落水淹死了！"这件事让

他幼小的心灵萌生了“造这种桥比不造还要坏！我将来一定要造大桥，让人们平安地过桥”的念头。渐长，他发现，那时中国所有的比较现代化的大桥都是被帝国主义者把持的，如济南的黄河大桥是德国人造的，郑州的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造的，沈阳的浑水大桥是日本人造的，云南的人字桥是法国人造的，等等。此后，他心中具体地燃起了“我将来一定要造现代化的大桥，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火焰。这造桥、授桥和写桥的火焰一直燃烧到他生命的尽头。

父亲有名，是因为他在1934年到1937年间成功地在杭州设计并建成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现在，即使远在美国的陌生同胞问起我的大名，我回答“Mao某某”时，他们都会问我是否 “茅以升”的“茅”。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确实有名。

那时，他在造桥工地旁的办公室里日夜忙碌，常奔波于京沪杭三地。他的工作我们孩子当然不了解，我如今只记得每天晚上等他的汽车喇叭响、等他吃饭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父亲领导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成功地完工后，他被中国文字里的美称、美名，如“中国桥梁之父”、“中国桥魂”、“楷模”、“一代宗师”、“恩师”、“先驱”等等囊括无遗。

从此，父亲和大桥密不可分，父名和桥名几乎合二为一，一提到茅以升，人们就会想到钱塘江大桥，反之亦然。这座桥对我家有特殊的意义，它是父亲留在人间的最珍贵的遗产、最具体的

为人民服务、最值得纪念的礼物。

他和桥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缘”不仅结在造桥上，也结在授桥和写桥上。这三者在时间上并不连续，在空间上也非比邻，所以，我将分段叙述。

关于造桥的经过，许多文章都已做过详尽的介绍，父亲自己也有专著《茅以升选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初版）问世，介绍了造桥的全过程，无须再由我来赘述，所以，在本书中，我只想谈一谈大桥建成后的第一天通车给我留下的一些其他文章不可能谈到的所见所闻。这一天虽然遥远，但我记忆犹新。

过去，每隔十年，大桥旁都有一次纪念活动，庆祝它的建成和通车。父亲最后一次探望大桥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1987年，即大桥建成50周年的纪念日。我那时在美国任教，未能同往，只是后来在报纸的一张照片上见到这次的盛举。

那时，他的“时年”已是九十有一，白发苍苍，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拿着望远镜在桥面上眺望着滚滚钱江东逝水。此情此景，我今日思之仍感鼻酸。那时那刻，我想他一定在浮想联翩，回顾他造桥的坎坷历程，感慨万端。

这张照片很自然地使我忆起1937年9月26日大桥通车的情景，因为这一天对我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它比父亲的订亲、结婚、生孩子、大学毕业，得硕士、博士，当教授、当校长、当院长、当委员，当各种代表、各种主席都更为重要，因为这座桥

关系到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几乎对这一天年年想，月月想，想到父亲，就想到这一天。

大桥首次通车的那天，罗英总工程师一家和我们一家乘坐第一列从南岸开往北岸的专用火车。除了飞禽以外，我想，我们是亘古以来第一次、第一批坐火车在现代化的大桥上跨过钱塘江的人类。

火车刻意为我们缓缓而行，好让我们仔仔细细地看看这座父亲亲手在地球上设计的大桥。父亲那天特别高兴——我们好像从未见他这样地高兴过。他聚精会神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车一寸一寸、一尺一尺、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像是母亲初次见到她自己刚刚会走的幼儿一样。他也一定在回忆着这桥的每一寸钢铁、每一车混凝土都凝结着他和工程师、工人们的心血和劳动。

父亲虽然在大桥旁工作了三年多，但身历其境地在桥上通过还是第一次。不过，大桥的一梁一柱、一桩一管，他都成竹在胸。他手里拿着望远镜，指手画脚，东张西望，口中念念有词，如数家珍似的告诉我们这里是几号桥墩，那里是几号桥孔，还特别指出十几名工人不幸遇难的地方。

父亲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我至今不明确他的阶级属性：他没有开过店、当过老板、做过股东，他不该属于资产阶级；他和苦大仇深的农民伯伯或工人叔叔没有血缘关系，他也不该属于无产阶级。但我只知道他热爱工人，不是嘴上说说、文章里写写的，

而是身体力行的。他常和工人们有说有笑地蹲在工地上谈天。我听说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一大困难是江底泥沙过多地聚积，打桩不易，需用沉箱技术，即工人们在用高压空气把水排除在外的沉箱内工作。父亲常和工人们一起在沉箱中沉入江底去了解情况。这项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还记得1937年夏，中日战火已炽，一日，正当他在水下30米处的沉箱内工作时，敌机突然飞来空袭大桥，我们大家都紧张万分。特别是母亲，她总是劝他不要下去，他却总是回答说："工人能下去，我就能下去！我是领导，我如怕死，还能领什么导！还能有什么威信！难道工人的命就不是命吗!?"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说话急如星火的神情。

在火车上，他望着滔滔的江水，说了一句"好了，九九八十一难[①]，总算通了！"

人的一生，总会有些令人难忘的特殊日子，如大学毕业、结婚或离婚、第一天上班、从医院里抱回初生的婴儿等等，都会在记忆中留下永不消失的印痕，刻骨铭心。这些事，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清澈见底，好像发生在昨日。对我家来说，大桥通车的这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日子。

接着，我们两家人在大桥工程处客厅中用了晚餐，此餐虽非宴席，但这是大桥建成后两位大桥领导人和家人们的首次餐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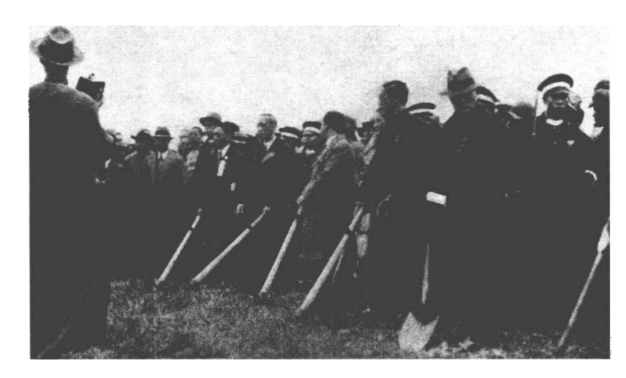
---

① 在遭遇困难时，我祖母总是对父亲说："唐臣（父亲的号，发音很像唐僧），你要学学唐僧，他西天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千万不要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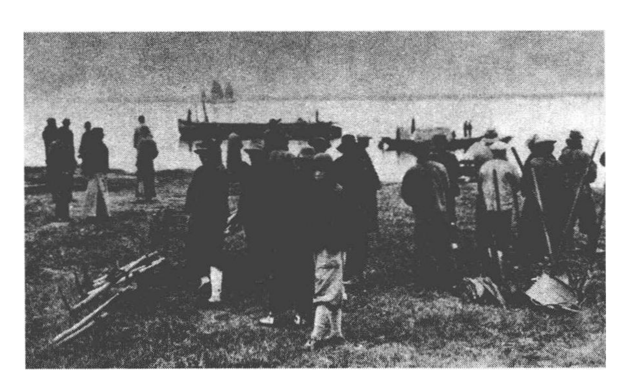
心情十分愉快。晚餐后，游兴未减，我们又乘汽车登上了大桥上层的公路桥，此时只见暮色苍茫，灯火已黄昏。远处的古建筑六和塔和现代化的大桥，遥相呼应，风帆点点散嵌其间，夕阳西下，照得它们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俄而，遥见远处客车蜿蜒缓行，从引桥登上正桥。汽笛数声，在宁静寥廓的江面上荡漾，是音乐家们写不出的动人天籁。从桥上看去，它们古今结合、动静结合，桥梁在夕阳的照耀下，像是人造的彩虹拔江而起，构成一幅美妙绝伦的人工和自然相结合的图画。此情此景，今生难忘。

没有想到这次的聚餐竟是我们两家在一起享用的最后晚餐。在日寇进犯杭州前我们都向大后方撤离，各奔东西。以后，我们两家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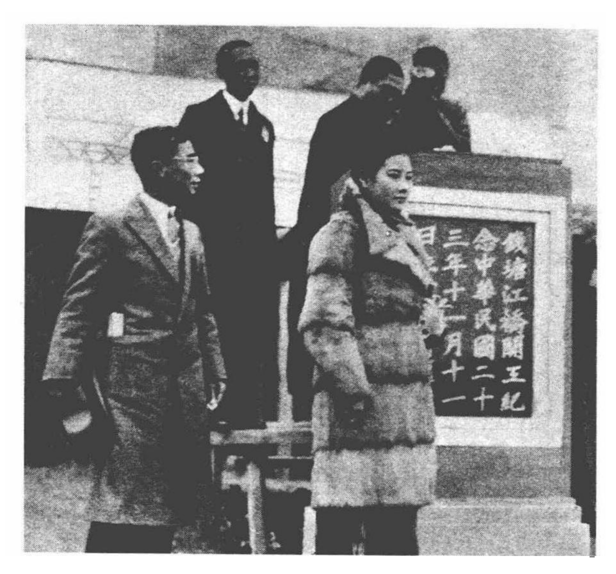
如今，曾经在父亲造桥时从他身旁流过的滔滔江水，依然一如既往地在他的铜像旁不舍昼夜地东流去。



1934年钱塘江大桥奠基典礼



1934年钱塘江大桥奠基时部分工人




1934年钱塘江大桥开工纪念碑揭幕



1937年钱塘江大桥落成

## 授桥——注重创新，不沿袭陈规

父亲一生除了上文谈到的被人们称道的诸多抽象美名之外，还有不少具体的美称，如桥梁专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此外，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1939年，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因抗日战争必须撤离，我们一家就从唐山经过湖南、广西，千里跋涉迁到贵州省的平越县。这是我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极度简陋而贫瘠的县城。

当地的乡绅、地方名流，知道一所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完整大学迁来，一定对繁荣本县的经济和文化大有裨益，有利可图，于是，他们便倾其所有，鼎力相助，积极地动员了一切力量，提供了一切资源，使大学顺利地迁入。

这片穷乡僻壤顿时变成了熙熙攘攘、名副其实的一座中国大学城。之后，那里的每一间房屋内都住过与大学有关的人员，莘莘学子随处可见。我家当然也就住在这“大学城”里，离大学只有几步之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名不见经传的平越竟是一块可和父母姐妹朝夕相处、团聚在一起的平安又宁静的绿洲，我至今难忘。虽然父亲在大学授课多年，我只有在这里才第一次目睹了父亲备受学生爱戴、欢迎的现场教学。

我那时在重庆上学，每年放假回家探亲时，每周总要到学校听纪念周会上父亲的例行讲话，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因为没有大礼堂，学校的大课、集体活动都安排在一座破庙中。

父亲的讲课非常有吸引力，使人易懂、易记。每次上课，都挤满了老师和学生，水泄不通，连窗外也都站满了人。没有大教室，学校只能不恭不敬地在庙宇的菩萨面前安放了一块大黑板，只见父亲在上面写满了数学或力学公式。讲课时，他使枯燥的公式出现在妙语连珠的比喻之中，幽默代替了说教，哄堂大笑代替了学生们的时时看表。他常说，教室里如听不见学生的笑声，是老师教学的失败。笑声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他还告诉我们，学生看表，不怪学生，要怪老师，因为他没有把课讲好，讲得有兴趣。他上课也从来不看表，总是在下课前一二分钟或下课铃声响起时正好把这课讲完。这说明他每课在事前都有充分的准备。

父亲说，一个好老师必须使他授课方法不断地更新、改进。

父亲在这方面也有创造，那就是“学生考先生”。这个新教学法一经宣布，就立刻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兴趣，教室里的空气立即活跃起来，好像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迎战，争先恐后地要把先生考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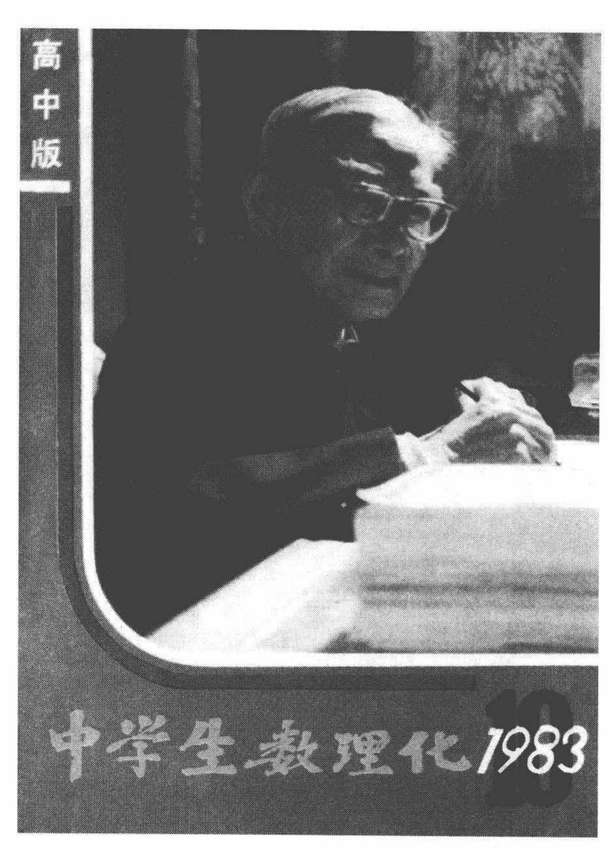
“学生考先生”！这确是亘古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一件特大新闻。这实在是个“引诱”学生去学习的好方法。父亲要求学生在每堂课前先出题考先生，这样，他们就必须在课前先下大工夫自己学习，把功课准备好，才能去“考”先生。父亲则根据学生们提出的“考题”作出回答。

有一次，一位学生提出的一道大概是土壤力学方面的问题，父亲果然无法在课堂上当场回答，于是，他就在班上大大地表扬了这位学生，说他学得好，有充分的准备，前途未可限量。还说：“很抱歉，我还没有你们学得好！”自从他提倡的“学生考先生”的“教学革命”以来，全班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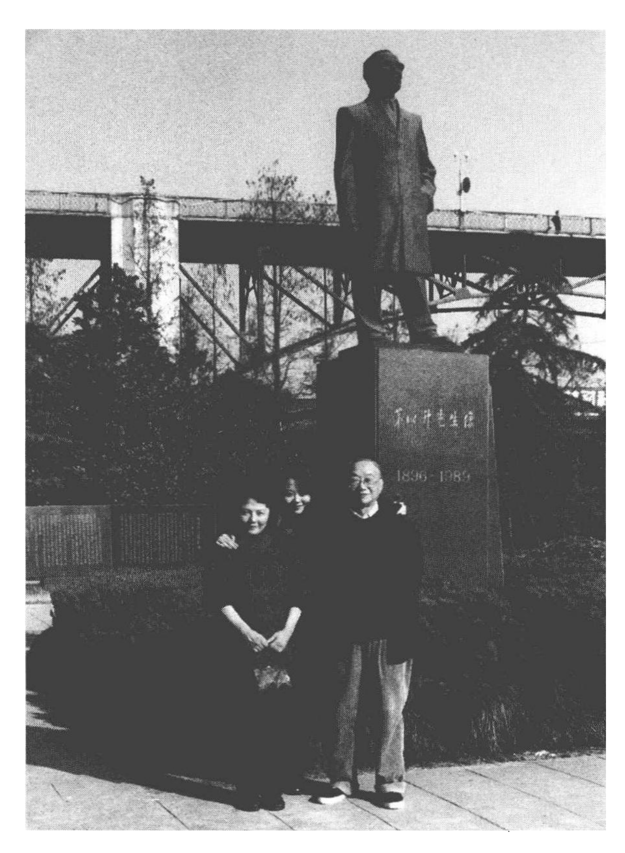
父亲常说，他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上的创造发明，都来自对学生的热爱。有了这种热爱，老师才会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地去研究为什么某个问题学生没有弄懂。热爱学生是当好老师的最基本、必不可少的动力。如果老师只爱自己所学的、所教的学科而不爱学生，这个课是无法教好的。

我就亲眼见过父亲热爱学生的一个真实例子。一个已经被校

方决定开除的学生夜间来找父亲，那天正好下着大雨，我们又正在吃晚饭，学生不敢进来，父亲就拿了一把雨伞，到大门口去和他谈话，我们一等等了很久。他回来后，我们一致责怪他："人家已经被开除了，打发他走算了，还有什么可谈的！"不料父亲反驳说："正因为人家被开除了，感到前途绝望，非常悲观，就更需要和他谈谈。他还要活下去，我劝他跌倒了还要爬起来。"我们听了都哑口无言，他也给我们上了一课，至今不忘。




1983年茅以升在授课




2000年作者家人在杭州钱塘江畔铜像前

## 写桥——桥文学的创始人

常有些朋友问我："从头衔来看，你父亲也颇得党的重视与推崇，在政治上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后被选为副主席、九三学社全国副主席、科协全国副主席，他去世后，许多大学的校园里以及钱塘江桥头都立有他的铜像。但是，解放后，他好像没有再像建造钱塘江桥那样地担任过某个大桥的领导工作，只做过长江武汉大桥和南京大桥和顾问、委员，这是为什么？"我的回答也只能是："我也不知道。"

前面已经谈过，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常见面，即使见了面，我也是匆匆来，匆匆去，很少推心置腹地谈到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后被任命为铁道科学院院长，院务工作十分忙碌。那时他已年近花甲，可能不能胜任造桥的繁重任务。我想，许多过去在他培养下参加过建造钱塘江大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桥工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代表他在建桥工作中作出了贡献。

父亲虽然没有机会再造桥，但他爱桥之心未泯，于是，不能“造”桥，就动起手来“写”桥。桥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建筑物，也是常见于中国文学作品之中的一个“有生命的”意象。特别是在我国的唐诗、宋词等作品中，它们释出的诗情画意屡见不鲜。

父亲就在工作闲暇之余，请他的秘书把这些名著中凡含有“桥”字的都加以摘录，供父亲使用。几年后，在他的一笔一纸之间就出现了一部厚厚的有关桥的著作——《桥话》。全书共分九册，几十万字，丰富多彩，蔚为大观。举凡世界上著名的桥的名称、地理位置、种类、式样、历史、用途等均有详尽的说明。他把我国一千多年前自李春建造的赵州古桥，以及珠浦桥、广济桥、洛阳桥、宝带桥和灞桥以来的成千上万的桥都收集在这部专著之内。我相信，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有关桥梁各个方面的如此全面、详尽、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我也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位桥梁专家，或文学家能以桥为主题，

写出如此宏伟的巨著。该书谈到，在人类的诸多建筑中，只有桥和自然界及人类发生的关系最多、最密切。

毛主席曾在会议上对父亲说："你的《桥话》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嘛。"他回到家后告诉我们这一"特大喜讯"时，笑得跟小孩子一样。既然毛主席都说好，当然是好了。

除了情书、日记外，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著的书、立的学，虽然第一位读者是作者本人，但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一定要写得使别人感到有趣，正如一位德国著名作曲家所说的，"世界上所有乐曲其实只有两种：使人感兴趣的和不使人感兴趣的"。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某人的作品别人读不下去，看不下去，听不下去，那么，这个作者的国籍、性别、生活年代、种族、派别、风格、年龄、技法等等也就不必去追究了。我相信，父亲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父亲的中、英文都很好，在中国科学家中，我相信他除了姓"茅"以外，他的文学修养以及创作才能也是名列前"茅"的。他写的文章永远生动有趣，使人读来欲罢不能。

在中国文化中，桥不仅仅是把天堑变通途的一段"路"，它还引起人们许许多多的联想。因而在中国文学中，人们提到桥的地方非常之多。不仅数量多，种类多，历史性的名桥也多。中国人是爱桥的民族。在"春风又绿江南岸"里，能够不出现"小桥、流水、人家"吗！

父亲在他的《桥话》中把桥与山水、园林、人物、历史、文艺、戏曲的种种关系都细针密线地写在一起。桥在父亲的笔下好像已不再是由石头、钢材、木料、泥土、铁索、水泥等这些冷冰冰的材料所造成的建筑物，而是常常变成了陪伴着人们悲欢离合的旧游之地。

他写道，中国的很多桥名也都极其富有诗意，如“春波桥”、“绿杨桥”、“海棠桥”、“胭脂桥”、“情人桥”、“销魂桥”，还有神话中的“鹊桥”等等。我们中国小说中的不少爱情故事也常发生在“小桥流水”、“断桥残雪”、“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近旁。因此，人们常触“桥”怀旧、触“桥”生情。

我个人最爱读的两首“桥”诗是杜牧的“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和葛一龙的“桥上飞花桥下水，断肠人是过桥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名句里虽然没有出现“桥”字，但我总在它表现出的朦胧美中见到瘦西湖里建筑精美巧妙的五亭桥和虹桥。我也爱一些含有“桥”字的宋词，如周邦彦的“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吴文英的“听啼鸟，立河桥，话未了”……诗人们一定和他爱过的人走过这些桥吧。千千万万个桥在父亲的笔下都一览无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父亲喜欢孩子，常为小朋友的教科书写有关桥的文章，如中学课本上的《石拱桥》。它传授了和造桥有关的知识，把造桥这种

复杂的建筑问题用浅显的文字写得通俗易懂，连我们这些大人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和孩子们举行座谈时，他还用实物来说明力学上的问题，把看不见的抽象变成看得见的具体：他用纸制作了一个小的长板凳，把它比作一条小桥。在平直的“桥面”上放上一个小墨水瓶，它就立刻和桥面一起坍塌下来；如果把这桥面做成拱形的，这墨水瓶的重量就会分散到两旁去，而不是聚集在桥面的某一点上，因此它就坍不下来。所以，世界上很多的桥都是拱形结构的。这样一来，孩子们就把造桥的基本原理弄懂了。

他为小朋友们介绍过不少古今中外的著名的桥，他还在许多场合里着重地介绍了本文前面谈到的中国的能工巧匠李春成功地建造出历史上最古老的赵州桥的故事。一千多年了，如今它仍旧丝毫无损地屹立在河北省赵县的洨河上。在讲解这座桥时，我看他谈的不仅仅是桥，而是借造桥的故事介绍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从而激发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他自己在谈到中国的这些古桥时也总是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情厚爱。

也许父亲认为过桥人、观桥人未必对造桥有兴趣，所以他对造桥技术这方面的问题很少提及。对广大群众来说，他的《桥话》的确写得很好，不仅富于文学性、知识性，也是他一生学造桥、造桥、炸桥、修桥的总结，他为造桥奋斗了一生，造桥也为他赢来了荣誉的一生，他本人就是一部活的《桥话》（关于炸桥、修桥的种种已在父亲写的许多文章中谈及，不在本书中多赘了）。

但我仍然为这位“中国桥梁之父”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多造些桥，或在他的指导下多产生一些“中国桥梁精英”，而感到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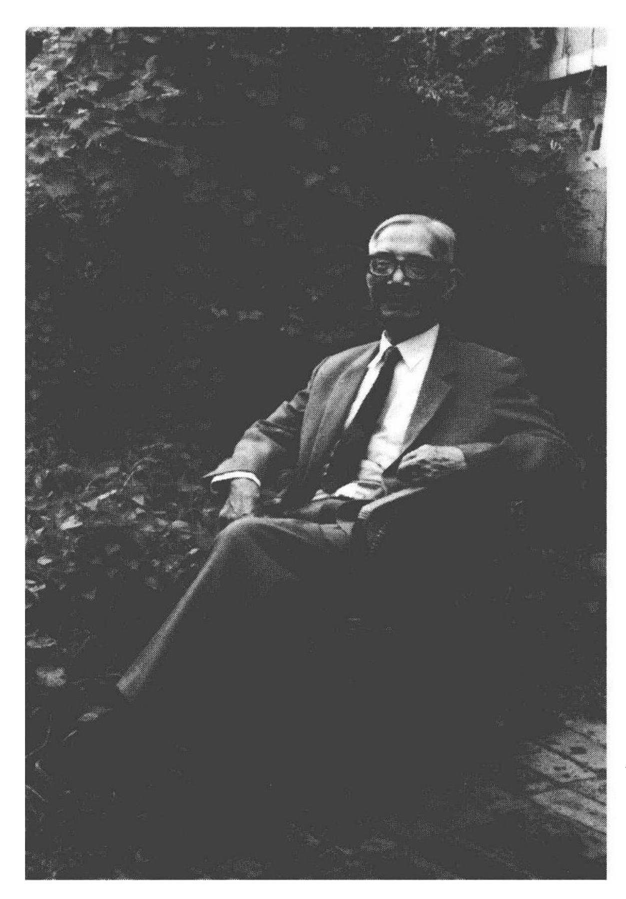
父亲一生写作不断，好像有无数的话要说，无数的东西要写，说不尽，也写不完。他1989年去世，我1988年去看望他时，每天清晨总是见他坐在案头笔耕。

除《桥话》外，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诸如有关教育、工程、科技、人文，甚至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里都有他的手迹。我查了一下，仅解放后，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就有230多篇，约有50万字。

他的文章的特点是永远饶有兴趣，大众化，通俗易懂。我的数学、物理水平极差，但他写的《力学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我查查字典还是可以从头读到尾。

父亲的身材不高，“著作等身”一词用在他身上恐怕尚不足以说明他知识的渊博。

最近，我回国探亲访友，见到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老同学，他见我正在写有关我父亲的文章，就说：“让我再给你添上一笔吧。你知道吗，成都街道上的路名十有八九都是用‘桥’字结尾的，可见人们对桥的喜爱。” 这又是一件中国人民爱桥的明证。



20世纪70年代茅以升于北京南沙沟寓中

# 另一座桥

## 飞向颠簸迷蒙的未来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解放以后，已经通过各种宣传“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认知，但现在有些人似乎仍然“崇美”、“亲美”。你看，改革开放后不是又有多少万人想方设法去美国留学或定居去了吗？中美建交后，好像在80年代掀起了一股留美热潮，我女儿班级里的二十多个学生就有一半以上去了美国，好像比解放前的留学生比例还要大得多，颇给人一种“一人留美，全家光荣”之感。

我1988年应杨伯翰大学之邀，任客席教授三年。为了签证的需要，我也趁机请该校五名教授联名写了介绍信，为我女儿成功地申请来美。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但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而不自觉。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虽是中国早期的留美学生，但封建思想中的“传宗接代”并未因接受西方思想而根除，他把儿子看成是继延香火的主心骨，荣宗耀祖大业的要员，对我寄予厚望。更何况我又是“小”儿子，这“小”字在中国语言里又常表示令人“怜爱”之意，因此，这“小”这“儿”，便是我在父母面前更加得宠的理论基础，使他们对我百般溺爱，百般迁就，因而养成我乖戾、孤僻、易怒、暴躁、唯我独尊的性格。于是，我这宝贝儿子从小就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霸王，甚至小暴君！姐妹们都对我敬而远

之，敢怒而不敢言。平常家里买了什么好东西、好食物，都是由我理所当然地捷足先登或先吃，父母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听之任之。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长大后，我回忆幼年时期的诸多恶行，悔恨不已。我也应学习卢梭，写一本《忏悔录》，用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衷心歉意。除此以外，我从小娇生惯养，受宠受溺，怕吃苦，怕困难。父亲是我的救世主，因此，我不需要朋友，目无群众。因我的一切苦难，一切要求，无论大小难易，到了他那里，都能逢凶化吉，迎刃而解。例如，每逢下雨下雪，或骄阳高照，我就不愿骑自行车上学，父亲就让他的公家汽车送我。同学们见到我从汽车上下来，都侧目而视，这“视”中包含着羡慕与厌恶。学校伙食不佳，我就独自一人跑到邻近的小饭店去包饭，使我严重地脱离群众，变成了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那时在初中上学，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要留级。留级很丢人，父亲不是督促我努力用功去迎头赶上，而是找当时的杭州市市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周象贤，替我换个学校，于是我就可以接着上课，不留级了。诸如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后来，父亲发现，我这种性格非常有害，不利于立足社会，便要设法改变它。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

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就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十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我觉得小提琴的声音真好听，也看见过小提琴家在台上演出后的那种一曲既罢，台下掌声雷鸣的情景，那实在令我羡慕不已，崇拜不已，就把这当做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因为父亲造桥，我们全家搬到杭州，此地有一所艺术学校，叫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林风眠任校长，内有音乐系，父亲便请了一位俄籍老师教我小提琴。他有一个女学生，叫费曼尔，琴拉得很好，是我童年的偶像，我很崇拜她，也去她家上过课，因为老师就住在她家。7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她家的地名是杭州银枪板巷19号。这件事，直接或间接地增强了我学习音乐的决心。我那时目光短浅，认为她已经是一位小提琴家，我将来必须要拉得比她还要好！

母亲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未来事，黑如漆”。确是如此。天下事，事事难料，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架玩具小提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老师为了赚学费，拉住学生，每次上课都夸我，说我拉得怎么怎么好。家里也无人懂音乐，我们就都信以为真、自鸣得意，以为未来的中国小提琴家非我莫属，其实，事实真相绝非如此。

父亲对子女最深刻的思想影响是“成名成家”。在幼小的年龄，我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常教导我说：“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1943年，我这“宝贝儿子”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也情不自禁地蠢蠢欲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但在那个年代，二战尚未结束，父亲不是国民党官员，无特权可用。他的简朴的生活证明他也不是大款，更非贪官，无力购买昂贵的美元，所以，中美航线虽通，但不是人人都走得通。要去美国，仍然是难如上青天。

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相互帮忙，相互利用，父亲也不例外。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梦寐

以求的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等“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工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译叙述文字，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很难学好、写好。”

但来美后，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出国那天，父亲亲自送我去机场，当时的飞机场不像是个“场”，没有正规的跑道，只在经过平整的土壤上起飞、降落。

一切票务、登机手续都在用芦席棚搭成的一个大“厅”中办理。它也是为数不多的旅客的候机室。

航班不定期，更不定时，机场命令旅客于某月某日在家等候，由电话通知，随叫随到，我们来回折腾了三次才和父亲含泪而别。

那时的飞机是道格拉斯DC-3小飞机，听说是由美国飞虎队承办的，只坐二三十个人，途经昆明、汀江，绕过喜马拉雅山腰到达加尔各答。此行有一定的危险，但我当时成名成家心切，颇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意志。心里怀着“不成名，毋宁死”这类的豪言壮语，我踏进了飞往印度的飞机舱门。

父亲那时已是名满天下，威震四方。我飞抵加尔各答后，即有国民党大使馆官员来找我。那时我只知国民党是合法的政党，不知道他们是反动派。我对他们不仅毫无警觉，还感到十分荣幸。父亲事前并没有通知他们。他们只认识我父亲其“名”，并不认识我父亲其“人”，但这个名人的儿子远道来此，途经异国他乡，日后难免有可利用我父之处，不可怠慢，遂邀请我到大使馆下榻。我还记得这些官员们每天下午喝咖啡（印度的咖啡是世界上最香的，完全不需要招牌和广告，香得使人们远远地就可以闻到），晚上看电影。据说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年年过，月月过。我当然也跟着去喝，去看。为了等船从孟买赴美，我在此又喝又看地过了半个多月，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逍遥、奢侈的生活。

那时，我见加尔各答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穿黄咔叽布军装的美国军人，我当然知道二战尚未结束，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军车在印度城市的马路上耀武扬威。有的还喝醉了酒，搂着印度女孩子在马路上游荡……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奇景。

接着我乘火车横跨印度到孟买，那时孟买的火车车厢互不相通，只有停车时才能走上月台，从一个车厢进入另一车厢。这时，旅客们便随便上下车，随便进入任何一间车厢和铺位，不必预订，十分混乱。我在熟睡中多次被他们吵醒。他们看起来像是农民或工人，十分贫穷，和我在加尔各答的大东饭店见到的旅客们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孟买为了等船，住了两个星期。我至今只记得，它是我出生以来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城市。

之后，我乘美国运输舰先南后北，两次通过赤道，驶向美国。学音乐的道路是危险的，前往美国的道路也是危险的。太平洋上仍有日本潜水艇。我们的船每晚都实行灯火管制——不可开窗，只许用红色灯照明，救生衣不离身。最后到达美国的西岸城市圣佩德罗（San Pedro）。从重庆到美国，全程所耗用的时间有两个多月，水陆空俱全，备尝艰辛，和现在的朝辞洛杉矶，暮抵上海市的大飞机的快捷、安全、舒适的旅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中美是同盟国家。我们旅客于1944年2月14日（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日子）靠岸后，意外地见到红十字会派来几十辆小汽

车到码头上来免费接我们去青年会大厅里打地铺休息。男男女女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素昧平生，但态度非常亲切友好，像是迎接死里逃生的家人、亲人，使我万分感动。我的崇美、亲美思想也因之而倍增。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不忘。

第二天，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买了车票，送我们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同盟军”去车站。我乘火车去纽约，大哥在中央火车站接我。以后，我便消失在这广大的美国人群之中，开始了我充满荆棘的迷蒙的未来生活。

后来我懂得了，任何路，只要你一旦踏上去，它就往往成了你的不归路。我的这条不归路的起点就是那架从重庆开出的DC-3的舱门。

当时年幼无知，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仅仅由于爱好是完全不够的。要想成功，除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外，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当时，父亲和我自己完全不理解我本人不具备这些条件，我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学毕业后，我就贸然地在父亲的大力帮助下，走上了这条赴美去学音乐的不归路。在美国我虽考入最负盛名的音乐学院，也毕了业，但离我的目标相去十万八千里！几年的炼狱，使我见到的是小提琴一孔内的恶浪滚

滚、苦海无边。虽说回头是岸，但岸到此时回已迟，何况它也未必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美国给我的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这场成名成家的噩梦！使我懂得了：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

不过，看看我周围的亲友、同事们在结婚、就职、入党典礼上当着上帝的面、总统的面、来宾的面、党委同志们的面所发出的铮铮誓言有多少是兑现的!? 这样一想，我未能落实我的鸿鹄之志，于1948年像散兵游勇似的活着回来，也就不必过分地自责了。

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安于做一个地面上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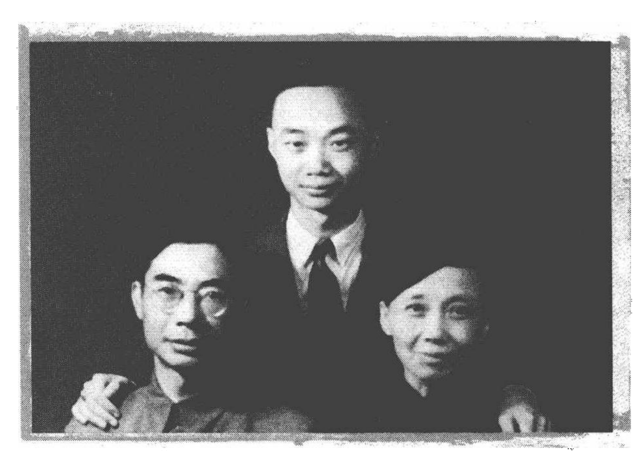
回忆几十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接受批判、斗争，成名成家之念早已置之度外。我更发挥了我的阿Q思想：幸而未成为备受批判的“三名三高”[1]或“洋名古”[2]的徒子徒孙。否则，我的苦难一定更加不堪设想了！

成名成家的思想，对人的一生来说，究竟是好欤？还是坏欤？我没有最终的答案。

---

① “三名三高”指文艺界的高薪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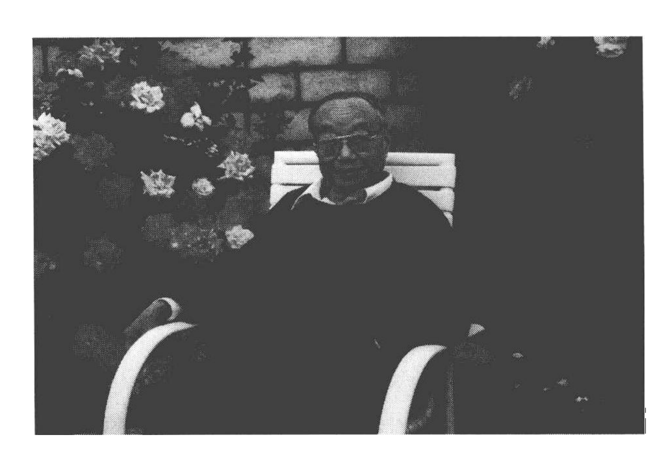
② “洋名古”指西洋的、著名的、古典的艺术。



作者与父母，摄于20世纪60年代



1985年,茅以升和儿子一家人在庐山



作者于洛杉矶家中

## 家书抵万金，亲情写不尽

不少人都知道，三十多年前，上海出版过一本书，叫《傅雷家书》，是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札，它传播甚广，十分有名。

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想到，其实，我父亲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 只可惜是我1948年回国时，正值解放前夕，时局动荡不安，未考虑把它付梓出版，公之于众。

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

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做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做至宝珍藏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66年夏，“文革”中，一群红卫兵革命小将来我家抄家，他们一进门，我就俯首就擒，被关在卫生间里。我因“反右”时“漏网”，被打成“漏网大右派”，属“黑五类”，但我一无金银财宝，二无美钞，三无古董，心中十分坦然。不料他们抄到了这札父亲给我写的英文信。对此，他们如获至宝，喜形于色，大概因为见到了这些信写于1944年至1948年，很有可能捞到一条与现行反革命罪行挂钩的“美蒋特务”的“大鱼”，可以居功自傲，索取犒赏。于是，就对我进行了审讯、训斥和责骂！当时，我已身陷囹圄，无所畏惧，就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根据党的“说老实话、当老实人、做老实事”的“三老”教导，对他们提出的非常幼稚可笑的问题直言不讳，给予实事求是的驳斥和“顶撞”。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自己的祖国遭受如此粗暴、无理的非难和侮辱，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深刻，所以虽事隔四十年，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也还是难以忘记。

我对他们说，文字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英、美等国家的无产阶级说的、写的也是英文；俄国沙皇时代说的、写的也是革命

后用的俄文。《共产党宣言》就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其实，这种说理是徒然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红卫兵小将的队长最后说："我们不管那一套，我们不懂英文，我们要把这些信带回去检查！"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信尚未见归还，不知它们如今散落在何方，父亲给我写的那些信，现在看来，对青年学生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如果它们有朝一日能重见天日，历险归来，我一定会推荐出版。我相信，这册《茅以升家书》也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欢迎和喜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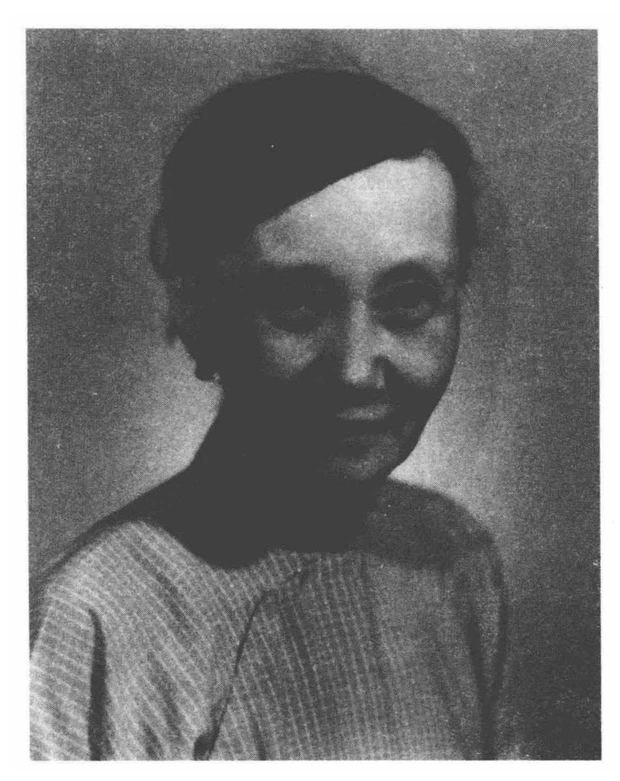
写完上面的回忆，我自然地想起我们家里还有两部仅供家人传阅的重要内部参考文稿：一部是母亲生前写给父亲的信。这些信在母亲去世后被父亲装订成册，取名《蕙君遗墨》。另一部是母亲去世后父亲为了纪念亡妻而写的类似编年史的回忆录，取名《蕙君年谱》。

母亲戴传蕙比父亲年长一岁，生于1895年，清朝末年。她没有进过辛亥革命以后的所谓"洋学堂"。她父亲是私塾教师，教她中文、孔孟之道，使她成为一位有文化的女性，后来也成为父亲的家庭"秘书"。那时，书香门第的女子都必须从小缠足。现在看来，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男性统治阶级为了增加女性的妩媚、性感，防止妇女淫乱社会、红杏出墙、"安定"社会而做出的有如酷刑般的规定。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既然是"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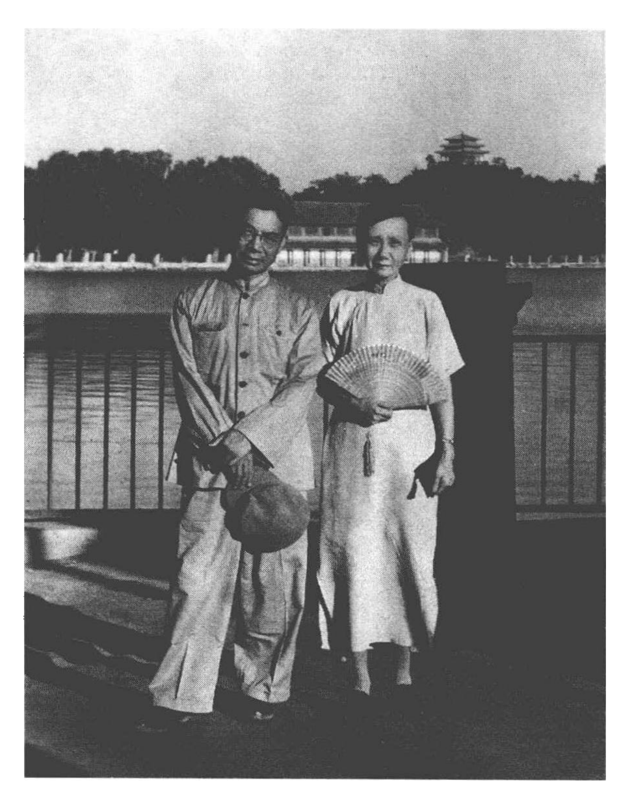
它就变成人人必须遵守的信条，不可违抗。我母亲出生在那个时代，当然也就自幼缠足，成了个小脚妇女。那时的名门闺秀们都希望把自己的玉足“裹”成一双“三寸金莲”。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就是以一双小脚而取名“金莲”的。现代年轻女性出门都能穿上高跟鞋，既保持了娉婷体态，又无损于健康，这是旧时代的女性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风气”是一种奇特的幽灵，它一旦出现，在各个时代的当权派的误导和推波助澜之下便大行其道，变得十分顽固，不肯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常不分青红皂白地趋之若鹜，在思想里依样画葫芦，把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为谬误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传之后代！例如缠足这种“风气”，显而易见是极其错误的，但它却延续了千年之久！这是有形的错误。那些经过日夜宣传的、无形的、人云亦云的错误思想要改造过来就更加困难了！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有哪位青年人头上不戴顶绿帽子，身上不穿件绿军服，腰里不捆上皮带子，手里不拿本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旁人一定认为这个人是出身于“五类分子”的家庭。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困缩在“隔离室”里“交代问题”，见到窗外威风凛凛，身上穿着绿军服、手持“红宝书”的红卫兵、红小兵小将们，觉得他（她）们真是美极了，真是羡慕极了！



茅以升夫人单人照



20世纪50年代茅以升夫妇在北京



茅以升夫妇，摄于20世纪50年代

那时，父亲公事繁忙，经常外出，而母亲这双小脚使她终生行动不便，足难出户，不便和父亲相随相伴，夫唱妇随，只能在家中留守空房。那时，电话不普及，只能以信代言，借以宣泄思念之苦，我想，她的一双小脚也是她一生写给父亲的信特别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夫妻之间的通信，无论多寡，都是和人们穿衣吃饭一样的平常事，不足为奇。为奇的是父亲把母亲一生写给他的信，除因匆忙离开杭州而遗失的抗日战争以前的信外，都一封不漏、完好无缺地保留着，一直到父亲临终前才装订成册，交给我小妹。

母亲的信不计其数，至少有几百封，厚厚的一大札。据父亲在序言中的估计，约有一百万字以上。封面上有父亲用毛笔写的“蕙君遗墨”四个大字，颇见功力。父亲在书面上提到母亲时永远称她为“蕙君”，母亲则称他为“唐君”。从这些称呼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爱慕情深也颇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古老遗风。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头至尾地，几乎是一字一泪地，把它们读了一遍。她的信写的都是些任何家庭都会经常遇到的日常琐事，又好像是我们的家庭日记、家庭历史，儿女们的学习、工作、恋爱、婚姻等等，事无巨细都有记载。回过头来看，母亲对这些事都常有“先见之明”，但我们那时常未能倾听老人言，一意孤行，走了不少弯曲坎坷路，追悔莫及！

这些信，仅从它们的数量之多以及时间跨度之长——从我的童年到中年，就可体会到它们封封都是母亲写给父亲的“情书”。母亲不是文学家，其中见不到什么华丽的文采，动人的词句。封建主义影响下的旧式妇女，怎能用白纸黑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丈夫明目张胆地说“我爱你”。她们的“我爱你”只能静悄悄地写入嘘寒问暖之间。因此，母亲的这几百封家书看似平淡，但字里行间浮现出的，不仅是他们的男女之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无限惆怅的离情——可以说，情情笃厚，情情难忘，人间百情尽在其中。

父亲为母亲的这部“情书”真迹还写了序，是一篇情真意切的好文章，充满着鹣鲽之情：

这里搜集了戴传蕙君自1937年起至临终前写给我的家书，在这以前的书信，因杭州旧居被毁，都已不存了。

各年书信，多寡不均，我在家时，当然无信，出外愈久则愈多，总计我所珍藏的遗书，在百万言以上，现经整理，编入这本《遗墨》的只其重要部分，其余均从割爱。

从书信里看出，蕙君富于情思，下笔千言，淋漓酣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

（她）立言爽直，不事矫饰，对人批评，动中要害，而以对

我为尤甚。肝胆之言，我终身引为规鉴。

…………

在整理编订这本《遗墨》时，历年往事，涌上心头，恍同看了一场电影，在电影中看到蕙君和我的唱随之乐，也看到了我俩的哀乐一生，五十五年的离合悲欢，不堪回首！

茅以升

1972年5月5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实，无烽火时，家书也抵万金。父亲能在外安心工作，有赖于这些报告平安的家书，它们解除了他思想上的后顾之忧。我们子女长大后，奔赴各地去上学，所有的家信都由母亲执笔，几十年来从不间断。“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然有个女人”，这个女人当然是我的母亲。

特别令我伤感、羞愧的是，她在信中也多处谈到了我，还对我赞扬备至，说我如何聪明、如何懂事、如何用功，几乎用尽了不符事实的赞许之词，今日读来，令我汗颜，令我羞愧，无地自容！我很想到她的墓碑前说一声：“娘，你过奖了！我一生不但没有带给你和父亲什么欢乐和幸福，反而使你们为我忍受了不少痛苦和灾难！如今我求恕无门，悔之晚矣！”

父母亲没有为我留下分文的遗产，但这份遗墨比任何遗产都更为可贵，因为它不是用金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父亲做事也认真，把这些信都保存得完美无缺，看不出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每张信纸都挺拔如新，有的还保留了当时的信封和邮票，看起来好像都是母亲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里寄回来的。

1967年，母亲已是“古稀”之年，身体素来娇弱的她，因经不起住所四周红卫兵的抄家批斗声、口号声、谩骂声、革命歌曲声和恫吓声，于1月13日深夜溘然长逝，连睡在她身旁的父亲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她已撒手人寰，回天乏术!我于当天接到电报，悲痛自不待言。我那时在上海工作，政治上的名称是“牛鬼蛇神”、“漏网大右派”，不可“乱说乱动”，更不可为奔丧这等私事请假。幸我单位领导宽大为怀，姑念下情，多次开会研究，钦准我请假一周。父亲和两位在北京的姐妹汇款来为我购火车票。我那时工资已被减到70元，仅够付房租和维持生命的食物。一到家，只见母亲卧室已人去室空。在年久失修、极其粗糙的泥墙上，父亲用极其粗糙的纸（“文革”期间，连较好的纸张都买不到）用糨糊贴着写的一副追思母亲的对联：

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
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我念及母亲一生为父亲工作担惊受怕，为儿女诸事操劳，

奉献一生，不禁失声痛哭！我一生头一次经受这样的痛苦，这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像母亲那样无条件地、盲目地、真心地爱我了！

母亲去世后，“文革”正方兴未艾，学校停课闹革命，很多机关也在进行“斗、批、改”，无班可上。父亲虽“闲居”在家，正好有机会写纪念母亲的这部年谱。但他那时已年逾古稀，看过不少红尘大小事，又是在旧社会生活过几十年的知名之士，和许多来自旧社会的各界人士，必然都有过来往，所以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因此，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知情人”，义不容辞地应为革命工作多作贡献。因此，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忙碌于接待川流不息、一日多批的来自祖国各地的“外调”人员。父亲家里一向宁静，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他家的人竟会如此地兴旺起来！

于是，他只能在晚饭后才动笔写这部心酸的回忆录《蕙君年谱》。它分年记述了母亲自19岁至终年73岁的小传。我赴京后，每晚坐在他身旁，夜夜长谈，共同回忆，共同补充，说到伤心处，我们常泪如雨下。为了减少父亲的查阅时间，我白天把父亲写的母亲年谱放在身旁，一页页地翻阅，回忆我家历年来和母亲有关的大事，作为我们这部年谱的依据，尽量做到事件发生的时、空的准确，晚上我把抄录的材料提供给父亲参考。这本数十万字的“孤本”即由我在京工作的两位姐妹抄录，分发给他的

子女和至亲。父亲还打算写他的《幼年回忆》和《留美回忆》，可惜未能完成。

父亲的写作分两类，一类是对外的，如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另一类是对内的，如《蕙君遗墨》和《蕙君年谱》，仅供家人传阅。我看，这些对往事的叙旧并非父亲书写年谱的真正目的。他是借此回忆，再一次地和母亲共度春秋，重温旧日的苦和乐。如今，我也常常阅读这两部未出版的文稿。每读一次，都使我感到他们仍然活着，在遥远的地方活着，在我们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活着。

这部《年谱》完成后，由他的子女、亲戚分头抄录。我大姐为此事写了一首诗，表达了我们那时对此《年谱》的共同心声：

夜夜灯前抄《年谱》，几回涕泪满衣襟。
征途驰骋非平坦，往事凄迷写逼真。
险径惊呼怜处处，亲人重忆恋频频。
百岁似此人间少，何幸相逢过半生。




《蕙君遗墨》封面



20世纪80年代，茅以升与茅为蕙祖孙二人

## 助人为乐

父亲一生朋友甚多，虽然未必遍天下，但也确实周遍了不少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瑞士、台湾和香港等等。最多的，当然是祖国大地。我想，除了他是个名人，人们常以做他的朋友为荣以外——名人的朋友未必多，我就见过不少孤家寡人的学者名流——父亲的温良恭俭让，不批评人、不教训人、为人谦和，以及使人如沐春风的言笑晏晏，也是他赢得朋友的主要原因。而更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助人为乐”，被助的人就因此而比他更乐，于是，乐乐相长，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就与日俱增。

中国人在颂扬某人的文章中，作者常常随随便便、不假思索地加上“助人为乐”、“热爱人民”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词。但是，用在这里的“人”和“人民”，谁都看不见，

摸不到。它们的定义不清楚，不准确，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亲人、友人、恩人、恋人、熟人、生人、仇人、敌人、犯人、罪人等人都叫做“人”，所以，这里的“人” 是泛指的、抽象的，不是具体的人，因而是抽象名词。我每每看到用在这里的“人”就不知道在13亿中国人口中，或全世界六十多亿人口中，它指的是什么人，哪些人。

从另外一方面看，“助人为乐”中的“人”听起来好像很多，其实为数甚少：我们一般不会去助陌生的人、无求于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以及那些“另册” 中的人。因此，这样“过滤”下来，能被我们助的仅仅只有我们身旁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了。

如果助了这些为数不多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就可以被封上“助人为乐”的美名，那么我父亲确是一个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助人为乐”的人。因为我有以下的丰富事实为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认识的亲友们都有工作，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机会使他去“助人为乐”。只能用他在旧社会的一些善举事实来加以说明：

他助了他的大哥在上海工部局找到了事，工作了几十年，一直到退休。1937年日寇侵入杭州前，他助大哥的女儿、女婿在紧急时刻离开杭州，还助了他大哥的大儿子通过英国的道门朗建桥工程公司赴英国做实习生，后赴美留学，是他大哥家的第一位留学生，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师。

他几乎助他妻子的全家人找到了工作，还在经济上资助他们。

他请的一位秘书几乎为他工作了一辈子。1957年，此人被打成右派后，生活困难，父亲每月都为他贴补生活费，一直到此人去世。

他聘任他的二叔在平越的唐山工学院当中文教授。介绍了不少建造钱塘江大桥的工程师来院任教。

我母亲体弱多病，孩子又多，只能请保姆帮忙。我家前后一共只请了两位。我们没有把她们当用人看待，她们在我家工作了一辈子，几乎成为我家的亲人。年老后， 父亲帮助她们享受退休工人的待遇。她们去世后，父亲让人把她们葬在钱塘江畔。

在“一片红” 时代，他助了他的许多亲友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从农村、工厂“上调”回城。

在改革开放后，他为大量的亲友以及他们的子女撰写留美学生推荐信，助他们获得了入学通知书，顺利地获得签证。

但他的更重要的助人——除了1937年为了阻止日寇进犯，把大桥炸毁，因而交通中断了大约十年以外，当然是这七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个百万、千万的祖国同胞，和世界各国的友人乘坐火车、汽车，或徒步，从钱塘江大桥上通过。这是人们几百、几千年来所盼望的大事，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真正的助“人”。

“助人为乐”用在他身上确是受之无愧、当之无愧的，他确实是应该为此而“乐”了！

# 这样的戏迷

## 京剧迷

父亲不打球、不打牌、不跳舞、不游泳、不溜冰、不酗酒、不逛商场、不会开汽车，很少看电影。但我从小就知道他爱看京戏，那是他唯一喜爱的文娱活动和消遣。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总是问祖母要几个铜板去看京戏。他最爱看的是梅兰芳。什么《四郎探母》、《玉堂春》、《汾河湾》、《霸王别姬》、《打渔杀家》、《女起解》等剧名，我那时就听说过，但它们的内容我则一无所知。

父亲因为爱看京戏，曾和母亲有过争执。现在想来，十分有趣，愿在此略叙一二。母亲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和父亲成亲的旧式妇女。那时的妇女在结婚后认为男人应该“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不该看其他的女人，更不该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看戏台上的女人唱戏、演戏！因此，她对父亲喜欢看男人演女人的戏颇有微词。她当然知道，梅兰芳是男人，但他在台上演的却是女人。我还依稀地记得他们夫妻之间有过类似这样的对话。妻：“你为什么专喜欢看男人在台上演的女人戏，而不喜欢看男人在台上演的男人的戏!？”夫：“我看梅兰芳是因为他的戏演得好，不是因为他扮了女人，我看的是戏，不是女人。”妻：“他是男人，为何要扮成女人，当然是要观众把他当做女人看！你已结了婚，就不应该喜欢看别的女人，我不喜欢你喜欢看别的女人！无论她在台上或台下，真的或假的!”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有趣，而且也发人深省，所以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当然无法争论下去，只有父亲自己知道，必须由父亲本人来坦白交代。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梅兰芳在台上当然是“女人”，父亲喜欢看的当然是女人，不是男人演的女人戏，因为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喜欢看女人演的男人的越剧。但我坚信，父亲永远不会坦白交代。

人世间男男女女的种种纠缠纷纭，我看无一不是来自类似我父母之间的这场简单的对话，只是情节不同、深度不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已！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是也离不开这个司空见惯，而又人人爱看的主题!？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男有女——由此而产生的异性恋或同性恋，就永远存在着不断地从这里发展出的主

题。它们虽各有千秋，但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宗”就是对自己所钟情的异性或同性的独占！

父亲虽然爱看京戏，但他却反对他的家人去学京戏，把唱戏作为自己的专业或事业。他有位侄子从小喜爱唱京剧，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后来想参加一处专业京剧团，并以此为职业，我伯父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坚决反对，说我家的孩子怎能去做“戏子”、当“吹鼓手”？但对我学小提琴，可能是因为小提琴是舶来品，是“洋”乐器，他就欣然赞同了。这只能说明他这位中国老留学生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崇洋、轻视民族艺术的思想：“唱戏的”、“拉胡琴的”不能算是“正当”的职业。他留学美国时，未必听过小提琴独奏会，但一定会在报纸上、电台里，见过听过小提琴演出的广告和作品，认为小提琴是“正当”的乐器。这当然也算是一种崇洋思想！但我一直认为，“洋”东西、“洋”思想、“洋”技术如果确实好，当然应该去“崇”。以二胡与小提琴为例，离开我们的“民族化”，就乐器本身的性能、表现力来看，我是无条件地崇拜后者，因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19岁时，我正式地考入了音乐学院，学的主要是“洋”音乐，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的戏曲。因此，我不了解京戏，不了解它好在哪里，美在哪里。我只知道他们唱的都是固定的唱腔，如“西皮”、“二黄”，打的都是类似的锣鼓点子，脸上画的都是固定的脸谱，走的都是固定的台步，各戏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好

听好看的，而且，戏中的唱词我一句也听不懂。不像外国歌剧，每出剧的音乐都是新创作，剧情、音乐、人物都不相同，没有固定的“青衣”、“花旦”、“小生”、“花脸”等角色，也没有固定的程式。当然外国歌剧里的歌词我也听不懂，美国人也未必懂得法文或德文歌词，但我听得懂剧中的音乐，我主要是去听音乐。

我在这里对京剧的这番议论正好暴露了我对京戏的无知，无知必然导致愚昧。

最近，我有幸承蒙老友王元化先生送给我他的近作《清园谈戏笔札》。拜读之余，感到它不像一般文艺理论读物那样隐晦曲折，讳莫如深。我既然能写这本小书，应可算得上一位小知识分子，但遇到文艺理论或美学等读物时，我便一筹莫展，只能呆望着白纸黑字，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昏昏然如堕入五里雾中。《清园谈戏笔札》这本书，通俗易懂、寓意深刻，是我唯一能从头至尾看得懂的一册有关戏剧的美学读物，它不仅比较彻底地改变了我对京戏的看法，也提高了我对其他中外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的分析能力和欣赏水平。我愿在此郑重地把这本好书介绍给喜爱文艺的朋友。

京剧已存在了几百年，一种事物能存在几百年，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这理由就是它受人民的爱戴，以及它的艺术性——只有艺术性才能经得起时间和改朝换代的考验。

我们不可能爱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如同我的许多朋友们不爱听交响乐或某种乐器的独奏会一样。他们曾经对我说过：“那么多人或坐或站地在台上又拉又吹又敲又弹地把一个曲子闹了半个多小时，或一个人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花上一个小时只弹或拉一种乐器，我实在受不了！”

父亲的热爱京戏引出了我以上的这段思考。要爱上一门艺术我们必须先花时间去了解它，熟悉它，把它融化在血液里。

我多么希望读过王元化的这本佳作后能再和父亲谈谈京戏!

# 所有的榜样

## 榜样的力量

### 抽烟

榜样，无论对人有益或有害，它的力量都是无穷的。

父亲不仅是生我育我的男人，也是我一生中，无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对我最有影响的榜样。仅举数例：

1944年，我23岁时去美国留学。在此以前我从未抽过香烟。在乘坐的美国运输舰上，购物是免税的。最好的香烟也只不过五分美金一包，十分便宜，而且包装精美，颇为诱人。这时，见到不少中国留学生在买，我也跃跃欲试。因当时不知道抽烟对身体的危害，只知道抽烟是不正当的行为，和吃喝嫖赌为伍，不敢

尝试。我还记得，那天站在船上的小卖部门口，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买，还是不买？想到父亲也是烟客——我至今还记得他那时抽的是“美丽”牌罐装的中等香烟，而且他说过，抽烟没有什么害处，因为血液不断地循环，可以把毒素不断地排除。既然他这位名人、科学家，我们全家的至高无上的榜样，都说无害，当然是无害了。正不敌邪，我还是解除了武装，下定决心，在众目睽睽下买了一包。天下事，无论好坏，都是开头难，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有无数次。这第一次的第一根烟点燃了我日后几十年的烟瘾！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几十万支香烟不知会减少我多少年的宝贵生命，浪费我多少本来就不高的工资！

如果那时父亲说：“你们将来千万不要抽烟，不要学我，抽烟有害健康。”我一定会把他的指示和教导记在心头，战胜小卖部前激烈的思想斗争。

1948年我回国后很想戒烟，因为美国人已开始宣传抽烟之害。但在工作单位里，所有的男性职工，无论老少，几乎无人不抽烟。我们在今天放映的中国电视剧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抽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的必需，表情的包装、剧情的渲染，和思想的源泉，可谓无剧不见烟，无烟不成剧！

有些杂志、报纸上也常出现叼着香烟、作苦思冥想状的作家、思想家的玉照。

我还记得，特别是在解放后的政治学习小组会上，大家必须

无话找话说，因为这是对思想改造的严肃问题，不可等闲视之。过去，我只知道借“酒”可消“愁”，后来知道了，借“烟”还可消“时”。于是，所到之处，只见人嘴一支或人手一根，边抽边谈，伴随着不通过大脑的连篇废话冉冉上升。只见天花板上烟雾弥漫，笼罩着一间一间正在“联系实际，畅所欲言”的莘莘学子，好像不吞云、不吐雾就非好汉一样。你如翘鼻嗅去，一定可闻得整个大楼无处不飞烟，真好像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泱泱大国变成了“烟烟”大国！

我意志薄弱，在亿万烟民的带动和感染下，放弃了戒烟的决心，也参加到他们为国家上交烟税的“爱国”行列中去。

幸好，1987年去美国，在美国人的强大戒烟攻势下，我的戒烟思想从量变到质变，一举成“戒”。21年来，我确是站稳了立场，未向烟瘾低头，与烟魔划清界限，彻底断交。还记得一次，我的家庭医生见到我，说我面色很好，我告诉他，我已戒了21年的香烟，他风趣地对我说：“恭喜你戒了烟，今后，你可有更多的生命来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真理’、多少个‘主义’、多少个‘特色’、多少个‘思想’在瞬息万变，一眨眼就可见到老母鸡变成鸭的奇妙世界！”

有人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这里也可看出，父母的“身”教，无论有益或有害，都是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榜样，都会对孩子产生深远、深刻的影响。为父为母者，不

可不慎！

## 文和字

小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那时工作还不太忙，因此我们相处的时间较多。父亲很关心子女的学习，首先是中文、英文和毛笔字。在这三个方面他也是我们子女的重要榜样。

他虽然是学工科的，但他的中、英文都很好。从他那里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文学家写了一部小说叫《红楼梦》，英国有个大文豪叫莎士比亚。那时我们当然看不懂，但由此而知道中、英文的重要性。因为他重视，我也就重视，努力学习。在中学，我的中、英文成绩俱佳，16岁那年（1937），在抗日战火中，全家撤退到大后方，我们从杭州辗转到达桂林后，我在《广西日报》上投了一篇题为《忆杭州》的文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稿，没想到它居然被采用了！我至今还记得，那篇文章虽然十分幼稚，但它不掺假、不浮夸，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言不由衷的大话、假话。全是些无修饰的童心写照、真情流露。因为那时我心中真是非常想念杭州，也许这就是他们看中此文的原因。很可惜，我这篇处女作在战乱中丢失了。

由于我的中文比较好，所以我就喜欢写文章。写文章必然暴露对人间事物的看法。解放后，我这写作的“恶习”未改，甘之如饴，因而闯了大祸。那时我还浑然不知，一个人写了真话，说

了实话——即使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也会构成犯罪！

从桂林又到了重庆。在南开中学时，我的英文也不错，老师每次都在课堂上宣读我写的英文作文。在校三年，我得过两次全校英文比赛第二名。“奖”是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使人前进的一种动力。以后，我便对英文更加热爱，更加用功，每个月读一本英文小说。我的英文能力改变了我下半生的道路。

1987年，我校一位教授来美讲学，我有幸被邀请担任翻译。因为我曾在纽约朱丽雅德音乐院毕业，被杨伯翰大学的一位教务长看中，让我留下来任客席教授。我做了三年后退休。

关于毛笔字，我还记得父亲说过：“字就是人的面容，一纸字、文均佳的信，可以赢得人们很大的好感，自己看看也是一种享受。”他自己的字就写得很好，他为母亲的信札写的《蕙君遗墨》这几个大字可以为证。可惜我没有在书法上下过更多的苦功。

很多向父亲递交求职信的人就是因为字写得好而被录取的。那时，没有电脑，很少人会用中文打字机，一切文件、信函都用手写。他的一位秘书，就是因为字写得好，被聘用，后来在父亲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

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我五六岁时父亲就教我用毛笔写字。他为我磨墨、洗笔。因为我的手小无法握住笔管，他就把我抱住，坐在他身上，用他的右手抓住我的右手去握笔。那时，我

记得练毛笔字用的是“描红簿”，即在红色印好的大字上用毛笔按照笔画的先后去“描”。我觉得很有趣，不久，我居然能独立操作，还受到父母的赞扬。后来，我当然没有成为书法家，也无此追求，但我却因此而看懂了中国书法之美，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这种乐趣，对未练过毛笔字，未临过、看过碑帖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也是无法欣赏的。现在，王羲之、怀素、郑板桥等人都成了我的莫逆之交，隔不久，我就想和他们的字见见面。其实，用毛笔写的字，也是一幅幅的“画”。中国的画家常是书法家，我认为，画和字都要表现线条之美、结构之美。这些“画”或“字”的线条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它们表现的只是一种无意义的抽象之美。例如怀素写的一个“戴”字，郑板桥写的一个“妙”字，可以使我欣赏良久。“戴”和“妙”被人赋予的字面意义和他们写的这两个字的书法之美是毫不相关的。

回顾一生，抽烟、中文、英文、书法都对我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都来自父亲活生生的榜样。

茅以升晚年写给儿子（作者）的一封信

## 简朴的生活

就我的记忆所及，父亲一生生活简朴，只靠薪资度日，没有做过生意，没有买过股票、彩票，没有发过小财，更没有发过大财。因此，他没有穿过、戴过、用过什么昂贵的“名牌”。家里连一件古董、摆设都没有。他从未买过汽车，当然更没有买过房子；他乘坐的车、居住的房都是公家分配的。我还记得，我家几十年来因父亲工作调动，住过不少房子，但我只对下面这所我要介绍的房子最感亲切、情有独钟。因为我们和父母同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最多，也都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它是个五居室的西式平房，有个小花园，是父亲一生住过的最好的房屋，也是我最难忘的旧居。

这座旧居理应为我父亲这位名人住过的故居，因为他造钱塘江大桥时，就一直住在这里，有其历史意义。许多名人住过的房

子，在他们过世后，就成了“某某某旧居”——这里的“旧”字当然是情感上的，有铜牌挂在门外以示纪念，并让人入内参观。此时，他们的“旧”居，不仅不旧，而且时时翻新、修葺，成为新“旧”居或“旧”新居。

中国字，十分奇妙，同一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旧”字，在中文里就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情感上的，含褒义的，如怀“旧”、“旧”雨新知、“旧”地重游、“旧”情复燃、“旧”居等等；另一种是物质上的，如破“旧”的房屋、穿“旧”的衣服、用“旧”的汽车等。

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从这处旧居撤离，虽然都不忍离去，却只有挥泪向它告别，时间是1937年9月。

解放前，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以及抗日战火，我们常常搬家，搬一次家就好像后来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抄一次家一样，连一些日用大小物件都在搬来搬去中丢失殆尽，都要在新居中因陋就简地重新添置。

解放后，父亲被调往北京时，几乎身无长物。不久，他把母亲从南方接去北京，住过什方院、织染局、西裱褙胡同等街道的普通民房，都十分简陋。冬天用煤炉取暖，直到1976年他80岁时才被批准搬入三里河的一处5室公寓，用上了水汀。但此后他因病多次住院，我每次从上海来京看他，他在病房里见我的时间比家里多，因此，享用此屋的时间也甚少。

父亲提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应该用的东西，只要条件许

可，再贵也要买，但是不要浪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重庆回到南京，政府要为他配备一辆汽车，他选择了一辆十分破旧的美国车。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见此车，就问他："你怎么坐这种车！"他说："为国家省几个钱也好，何必招摇过市。"他打草稿的纸都用过正反两面的。他的一张藤椅坐了大约有二十年。他对于生活中的物质条件要求甚低，从不向党向人民提出任何改善生活的要求。对儿女花钱也严格要求，还记得我十几岁时，因为花了八十块钱（那时的法币）买了一部猎狗牌自行车而受到父亲的严厉批评。

即使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也从未提出什么改善生活的要求，逝世前住的仍然是三里河的那套公寓。

他没有什么花钱的爱好。一次，他上街去寄信，回来说："我今天才知道，马路上有那么多的邮筒！"

他的爱好和兴趣是写文章、看书、和朋友们聊天、和家人一起在外面吃个馆子。此刻我还能记起他在餐馆点菜的神情，每上一道他爱吃的菜，他总是喜笑颜开，别人看了也高兴。此外，就是和名人会晤。和他常来往的我记得有周培源、赵祖康、方毅、严济慈、赵朴初、汪道涵等人。只要毛主席、周总理或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请他去开会，他总是眉开眼笑地欣然前往。一次，他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江青在杭州请他吃过饭！那时，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还不是"四人帮"的头目。



后排左起：作者、父亲、大姐；中排左起：母亲、妹妹；前排三人为外孙辈

## 处变不惊　临危不惧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预知，更非人力所能控制，如预测地震。如果地震局测到某个地区在100年内可能发生大地震，这种预测究竟有何意义!? 人定不能胜天。我们的豪言壮语“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也没有能阻止我国年年发生的旱灾和水灾，以及地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只能面对、善后，把损失减低到最小。即使是人祸，也非芸芸众生可以防止。以下是父亲几件处变不惊的故事。

我还依稀地记得，大约在1932年，我11岁，父亲到镇江去做水利局局长。那年春天，长江在镇江附近决堤，把城市变成水乡泽国，灾民无数。父亲身为镇江水利最高负责人，责无旁贷，被勒令停职检

查。那时我读小学，至今我还记得在课堂上我顿时变成了类似“文革”中的“狗崽子”、“黑五类”等众矢之的，任人奚落、谩骂。老师还在课堂中说，政府要给茅以升竖“铁像”。我那时不知道这“铁”、“铜”之分。后来，才知道铁像竖坏人，如杭州岳庙内的秦桧；铜像竖好人，如各国的伟人、名人、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等等。那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也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但我记得那时父亲仍然十分镇静，颇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风度，积极地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后来查明，父亲没有贪污，没有枉法，决堤的责任不在他，因而官复原职。

1936年，钱塘江桥在建造时，有十几位工人因施工发生意外而遇难。我还记得在岸上停放着遇难者的棺柩，家属在旁哭泣，状至悲戚。这是造桥工程中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件大事，但很多有关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我认为这是撰文者对工人阶级缺乏情感、不够重视的表现。我那时已上中学，比较懂事了。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父亲的心情十分沉重，寝食难安，但仍有条不紊地面对事实，处理善后事宜，得到家属们的谅解。

上海解放前夕，我父亲的许多亲友都决定去美国或台湾。一日，父亲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陈良的夫人到访，说蒋介石有意请他做上海市市政府秘书长，如上海不守，她也可帮助我们全家去美国或台湾。父亲听了吓一跳，急忙以看病为由，躲到当时的同济医院。我们全家顿时被笼罩在恐惧之中。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对国

民党深恶痛绝，我的三舅父就是国民党的大官，他来看母亲时，父亲都不大理睬他。父亲不了解共产党，但痛恨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这时，周恩来总理也派人和父亲暗中联络，希望他留下，并说保护他的家人和财产的安全。父亲受宠若惊，决定留下。

1948年夏，我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毕业回国。我那时的女朋友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文艺界知名人士。当时，她家对我这有名人之父的美国留学生，非但不排斥，而且十分赞同。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她就向我介绍，要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不要留恋城市的抽水马桶。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孙中山先生早就教导我们要以俄为师，我们和苏联的友谊万古长青。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共产党反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要打倒地主，解放农民，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共产党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不要做官，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不徇私、不贪污、不腐败，不取人民一针一线，爱的是人民。既然世界上居然有共产党这么好的政党，她又可能成为我的妻子，我当然相信她的话，也决定留下。

但是，我们全家是否留下的决定权还是在父亲，我们唯父亲马首是瞻。父亲痛恨国民党，但并不了解共产党。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增强了他留在大陆迎接共产党的决心。

上海解放前，蒋介石曾派专机来沪，请父亲去台湾，父亲婉

言拒绝。在这之前，有一天，蒋曾邀请他去官邸接见，我们都非常害怕，因为蒋手上一定拿着枪杆子，身旁一定站着大汉子，完全有可能让大汉子拿枪杆子逼迫父亲就范。但我们又不能置之不理。不去，也可能遭人暗算。最后，母亲提出，让我的妹妹陪他去，是凶是吉，总还有我妹妹知道。

他们平安回来后，妹妹告诉我们："没想到，蒋介石在表面上对父亲还十分客气，也没有抨击共产党，只说'你们将来恐怕受不了共产党的统治'。父亲真是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推说身体有病，待日后有机会再尽绵力，而逃过一劫。"

父亲不是国民党，什么党都不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与任何党、任何派、任何帮有任何瓜葛。蒋看中我父亲当然是因为他是著名学者，在中国广大群众中，以及在台湾学术界都有极高的威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还记得，前一天深夜，有人打电话给我父亲，我只听他说了两声"好了，好了！"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赵祖康（国民党最后一任的上海市市长）给他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上海解放了。父亲平时沉默寡言，他的"好了，好了"的意思大该指的是：国民党全军覆没了，以后不会再找他的麻烦了，不会再打内战了，一切要看今后的新政府了。

第二天，一觉醒来，只见上海的早晨变了样：解放军叔叔穿草鞋，睡马路，纪律严明爱人民；胜利的旗子哗啦啦地飘，男女

老少齐把秧歌跳；万众一心齐欢唱，红旗飘飘似海洋；敲锣打鼓庆解放。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画像高高举，中苏友好万古长青、万年长。翻身的日子来到了，家家户户喜欲狂，喜欲狂！

一夜之隔，上海几百万的人民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今以后就可以站起来，过上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再受人鞭挞、欺凌、侮辱、恐吓、斥骂的安居乐业、繁荣富强的日子了。父亲见此情景高兴地说："我们留下来留对了！"

父亲除了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的刚强意志外，城府也深，为人处世谦虚谨慎。他在大陆留下来以后，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从未听到他发表什么激烈的言论，说过什么牢骚过甚的话，写过不合时宜的文章，或从他"口"里出过什么"祸"。我也从来没听过他在背后讥人之短，因此，他没有犯过什么大大小小的"错误"，保持了很好的"晚节"。即使在"四人帮"最猖獗的年代里，甚至红卫兵小将曾经在1966年他70岁时勒令他在单位里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在单位里游行示众了一整天时，我也没有在家里听到他说过一句"反动"、不满的话。有时，谈到有关"文革"的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时，他总是笑而无语，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也就戛然而止了。也许，这就是他在历次运动中，无论窗外的谩骂声、批斗声、口号声如何啼不住，他总是能化险为夷，乘着他的轻舟越过万重山的原因之一。

# 茅以升图书馆

2008年岁末，我最后一次在电脑上搜寻有关父亲的造桥资料时无意中发现远在新疆的建设兵团农七师五五新镇的边上有一处茅以升图书馆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使我们惊异万分，因为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电脑上我见到了这所简陋、塞满图书纸张的“茅以升图书馆”——是用红布条贴上白纸剪字经过风吹雨打歪歪斜斜地悬挂在门前的屋檐下认出的。在这里，人们见到的不是窗明几净、藏书林立，正襟危坐、鸦雀无声的莘莘学子阅读、求知的殿堂，而是酷似街道生产组的废品回收站，但正是这一景象显示出创业者的艰苦卓绝和对我父亲的敬爱。

父亲逝世后的20年内，不少中、美大学的校园里和钱塘江畔都竖立了他的铜像，出版了他的著作、画册和邮票，但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应该是这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图书馆，在纪念我父亲的同时，它无声无息地、默默地、夜以继日地把知识带给了千千万万的群众，真实地、具体地在“为人民服务”！

这个不像图书馆的图书馆是朴胡南先生白手起家、孤军奋战、独自创办的。朴先生和我父亲无一面之缘，从大量的书卷收集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朴先生对知识的重视，对炎黄子孙的热爱，把父亲和他们天南地北地联结在一起。

我隔着汪洋大海、千山万水，在异乡他国向朴先生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敬意，今后，我们想到父亲就会想到钱塘江大桥，想到茅以升图书馆，想到您。

预祝您的——也是我家的这一图书馆藏书和读者日益月滋，不断地扩展、壮大。在未来的岁月里，无数个桥梁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学家都会带着从这图书馆获得的知识为造福人民走向祖国大地。

“人海遇知己，简陋见真情”，让我用这首打油诗再一次地表达我对朴先生的爱重。




位于新疆的茅以升图书馆

# 两句令我深思的比喻

## （一）文章是固体，言语是液体，思想是气体

父亲一生做过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除了渊博的专业知识外，他教书时所说的很多话，也好像都是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似的，都非常有趣，浅显易懂，寓意深刻，令人难忘。和他谈天，听他上课、演讲，都是一种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们获得了知识。他的这种“话风”无疑也是他深受学生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8年，美国一大学请我任客席教授，临行前我专程到北京去看望了他。父亲平时不苟言笑，话不多。这次他见了我，说：“你即将出国，以后见面不易，我们好好谈谈吧。”

谚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实，星星之“言”也可

以振聋发聩、指点迷津。我还记得，那是深秋季节，他坐在一张大约已经坐了十多年的藤椅上，身穿西式背心，对我笑了一笑，说："关于我说的'文章是固体、语言是液体、思想是气体'以及'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你是否赞同，我洗耳恭听。"

那次的谈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时机重要（我即将离开祖国）、内容重要（谈到了很多我关心的"国家大事"），所以印象深刻。以下只是我的零星回忆，不是做文章。我力求保持着我们谈话内容的"庐山真面目"。

他说："文章写出来以后，一旦出版了或公开发表了，无论它用黑字写在白纸上，印在书本上，或刻在山石上、石碑上，它就永远固定在那里，变成了人人看得见的、记得住的、永不变形的固体证物，欲毁不能，欲删不能，欲改不能，欲赖不能。它必然让作者或流芳百世，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的《反对自由主义》，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或遗臭万年，如大汉奸汪精卫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从河内向日本军国主义发出的投降书'艳电'，秦桧和金订立的《绍兴和议》等等。

"语言则不同，你今天说的，可以和昨天说的不一样：你昨天说它是黑的，但今天可以说，'不对，我昨天说它是白的'。你明天说的，也可能和今天的又不一样，说它是红的。语言确是像流水一样的液体，可以不成形地随意流动，随时改变方向，甚

至还可倒流、逆流、潜流、暗流，前后矛盾、相互冲突、朝夕万变。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听其言，观其行’，还有一句，叫‘口说无凭’。它们既然成了‘成语’，就具有普遍真理的价值，所以，人的言语并不可信。有人当面说得好听，才过了一天，你再问他，他会理直气壮地对你说：‘我没有说过啊！’否则，我们订合同为何必要当众开会签字，还要拍照、饮酒、握手言欢、拍手助兴等等让人看得见的公开仪式和行动？

“我最后把思想比作‘空气’，我觉得这个比喻更是非常贴切，天衣无缝。它们都是无形、无踪、无声、无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一种存在。人不能一刻离开空气，人也不会在清醒时停止思想。思想本身无法暴露，它是通过语言、行动、眼神或其他的物质外壳，如音乐、绘画、舞蹈、雕塑来表露的。灵魂深处的思想——不是嘴上说说的那些好听的豪言壮语或甜言蜜语——才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文章和语言只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前者表现在文字符号上，后者表现在规范化的音响上。思想当然是人的大脑中的一种无形的活动。它一定和生命连在一起，人们只能通过物质外壳来了解人的思想。但这个外壳和思想本身常常并不一致。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你这句话不应该说’或‘那篇文章你不应该写’的忠言或劝告吗？因此，你平常说的或写的，常常不一定是你的灵魂深处所想的。”

我回答说：“人们的思想永远是自由的，不受家庭、社会、政治、宗教、主义或别人的思想的种种压力而停止在脑海里的时、空中纵横驰骋。它无所不及，无远弗至，无深弗届。我们说，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人民的言论不自由，但没有人说过他们的思想不自由，因为思想是禁不住的，即使在‘文革’最猖獗的时期——每个工作单位都在进行着‘斗、批、改’，‘隔离审查’，‘天天读’，读一句《毛主席语录》后要用右手高举红宝书，并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唱样板戏，在毛主席巨大的画像前‘朝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以及我单位有十几位同事不堪种种斗争、凌辱而‘畏罪’自杀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也仍然是自由的。

“至今还记得那时整天整夜盘踞在我头脑中的一首反映客观世界的我自己创作的打油诗：处处牛棚处处斗，处处‘万岁’处处歌；批、跪、关、杀平常事，跳井、开气求解脱。”（我那时的工作单位，只有不到一百人，就有二人自杀，一人被枪决。）

父亲听了以后，说了一句“四人帮”真是心狠手辣！

由于我没有，当然也不敢，把这首“诗”转化为物质性的文字或语言，所以我逃过了一劫，活到了今天。

父亲接着说：“由此可见，思想不仅不可能长期禁锢，它最终必然会表现为听得见或看得见的‘液体’或‘固体’。你今天把它禁了，它明天又冒出来了；这里禁了，那里又冒出来了，它是禁

不胜禁、查不胜查、捉不胜捉的！谈到这个问题，我总是想到毛主席的教导：‘隐瞒是不能持久的。’其实，‘禁’也是一种‘隐瞒’，也是不能持久的。事实证明，愈是被严禁的书，人们愈要看。人民是有头脑的，好书坏书，真书假书，人民自有公论。

“因此，我鼓励学生们要用大脑多思多想，对人世间的各种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求找出正确的答案。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更为重要。他们的思想一旦化为指导行动的固体文件、政策，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人民的或祸或福，常在他们的大笔一挥之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出的是各式各样的政权——其中包括酋长式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独裁的、社会主义的，可是它里面未必出真理。有时，枪杆子不仅不保护手无寸铁的人民，反而助纣为虐，使几百万、几千万人死于枪杆子之下，这是由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人的思想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的。如果婴儿出生后在荒岛上和动物们为伍，他虽然有大脑，但我想，他仍然可能只有简单的条件反射，如饿了想吃，困了想睡，遇到危险会本能地逃避，但这不是人的大脑所进行的只有‘人’才可能获得的‘思想’。

“在西方最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受宗教的影响，认为地球是方的，不是圆的，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是宇宙的——不仅仅是地球的——救世主、救星！他便可以有统治宇宙的绝对权威。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是‘真龙天子’（天的儿子），他的话就是‘圣旨’， 但那时的芸芸众生并不都认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反动的，大多数人还把它们当做金科玉律来顶礼膜拜！

“回顾历史，人的思想当然是可以改造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是以正确来否定错误，而不能反之，也不可能以一个错误去取代另一个错误。

“所以，世界之所以能进步，因为有不惜生命、不畏强权，为真理、为正义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的人们！我们应该脱帽向他们致敬！没有他们，我们可能至今还生活在史前的茹毛饮血、奴隶社会或酋长国的时代！”

我说：“你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你为学习方法所总结的‘十六字诀’：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分析问题的。我坚信，不合理的事不会永久地存在。您看，我们的男人不再被迫梳辫子、女人不再被迫缠小脚、对皇帝不再跪着禀告、男女平等、人民可以在报上写文章批评政府。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不是也早已垮了台吗。”

我有幸亲逢美国2008年的总统大选，如今，过去当过奴隶的美国黑人居然可以昂首阔步地竞选总统！我举双手赞成。只有合乎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才会永存，才会发展和壮大。

## （二）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

父亲继续说，“我要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意见，它是否正确？”

我回答说：“您这句话，确是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但它也触及我的灵魂，引出了我平时不敢说的许多思想。我认为您这句话表示的，是人类一切求生活动的核心，亦即‘公’与‘私’的相互关系：前半句是手段，是‘公’；后半句是‘私’，是目的。因此，前半句必须落实在后半句上才能永存，否则这前半句便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或根本不会出现！

“‘四人帮’上台后，以冠冕堂皇的‘破四旧’为由，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活动，掠夺民间的金银财宝、外币、古董等贵重物品，用以维持濒临崩溃的我国经济。对广大人民则强调‘斗私批修’、‘无私地，无条件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只允许人民‘帮别人的忙’（即为人民服务），禁止‘帮自己的忙’（即自私自利）。谁要是只帮自己的忙，那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不要做官，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等教导没有学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是无私的。在这个庄严、宏伟的前提下，人民就不该为自己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于是，无论生活如何困苦，大家就只能哑口无言了。如果你‘言’了，你就是资产阶级

的‘代言人’，要受到批判或‘处理’（降职、减薪、劳教等等），那时，人们能为‘私’字的地方实在已经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连满足人民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有困难。我的一些朋友的子女，为了等一间房结婚，一等足足等了十几、二十年，都等老了！我那时也买不起一件新衬衫，洗一次补一次，满身是补丁，不过不要紧，那时以破为荣、以破为进步、以破为时尚、愈破愈革命！

“于是，我那时所能要求的只能仅仅是‘活着’，除此以外，我个人的一切向往都是资产阶级的。例如，你到北京工作后，上海的一套二居室的公寓当然就留给我住，因为我在上海工作。为了这间独用的厨房，我不知挨了多少批、受了多少斗！因为大多数人家的厨房都不是独用，而是七八家合用的。吃饭时，他们只能屁股对着屁股地在厨房炒菜。而我的则是独用的，因为舒适、方便，所以它属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后来还强迫我让出一房来给单位的同事住。一住住了三年。这些事，我过去很少在信上和你谈，以免被检查人员查看，对我批判，使你为难，而且，说了也无用。

“其实，你走在马路上，一眼望去，到处都可见到各式各样的餐馆、医院、学校、银行、药房、书店、旅社、电影院、邮局、超级市场、售车行、修车铺等等。凡是活人、病人、死人所需要的一切，似乎都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帮别人的忙’。其最终

目的当然是为了‘帮自己的忙’，即帮自己赚到了钱，帮自己改善了生活，或帮自己赚到了‘名’。如果只是为了‘帮别人的忙’而不落实到‘就是帮自己的忙’，我看，过不了几天，这店、这院、这行就要全部关门大吉！不仅如此，它们根本就不会出现。人的一切活动的终点只有落在这个‘私’字上，才能持久、才能兴旺，才能永不停滞。如果人人都不为‘私’字去赚钱，去开设以上那些对人民生死攸关的各行各业的话，我们大家至今一定还过着个体的渔、樵、耕、猎的原始人的生活！只有大家联合起来，一刻不停地共同为‘私’字而努力奋斗，人类才有可能获得现代化的文明和生活。

“你不信吗！？我们在报纸上常读到这样的新闻：某某人中了大奖，得了几千万或几亿万的巨款之后，他就立即辞去他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帮别人的忙’就可坐在家里花钱买别人的‘帮自己的忙’，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可得到人间的一切物质需要和享受。有人曾和我开玩笑说，‘如果大家都中了头奖就好了，都不必工作了！’我说，‘那就糟了，我们大家就只能靠自己去种地、织布、造房子、杀猪、杀鸡、宰牛、宰羊，打猎、钓鱼、捉虾，去过原始生活了！’

“我们常不敢承认，‘私’字是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创造人类一切文明、文化的永不停歇的、必不可少的唯一动力。你要为生活过得更好而去赚钱，你就必须首先想方设法地把

你的产品造得比别家的更便宜、更好，把你的服务做得比别家更周到、更体贴、更方便。当然赚钱是目的，这‘更便宜、更好、更周到’只是手段。这样，整个社会就一定会在‘私’字的带动下而被迫地向前推进，你拦都拦不住，挡都挡不了！

“举个简单易见的例子：我家附近的餐馆很多，只见它们开开关关，热闹非凡。价高、味差、服务劣的一定门可罗雀；价低、味美、服务佳的一定门庭若市。优胜劣败、自生自灭，这是自然法则，非人力所能改变。大家都在竞争，其结果一定是大家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餐馆开得又便宜又好。你若不好，你就关门！

“由此，我想到‘文革’期间上海的一家人民食堂。那时我每天早上到一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天，路过这家人民食堂，因为未在家吃早饭，就去就餐。只见店堂内挂着的红布白纸上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标语。意思是：顾客先付钱买饭票，然后自己取菜取汤、盛饭盛粥、洗筷洗碗、擦桌擦椅，不要做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坐在那里等人来伺候。只见这些‘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谈笑风生，目无顾客。其实，人民到人民食堂来吃饭，为的就是不自己动手，宁愿多花些钱，靠别人动手就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可口菜肴，顾客因此而省事，食堂因此而获利，国家因此而增加税收，否则，人民完全可以不出门，就在自己的家里去‘自己动

手’好了，何必一家老小、兴师动众地到餐馆去‘自己动手’呢！不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拿的是固定工资，年年如此，月月如此，不增不减。门可罗雀或门庭若市，都与他们毫不相干!?果然，过不久，这家人民食堂里的人民因为不首先‘帮别人的忙’，他们也就无法‘帮自己的忙’，而关门大吉了！

“其实，人活着，就必然有‘私’。我们反了几十年的‘私’，但对这‘私’字从未有过明确的、科学的定义。例如，如果我每天为一棵桃树浇水，桃子熟了以后是否只应该留给别人吃，不给自己吃？如果我自己有‘想’去吃它的‘一闪念’，或真的把它吃掉了，这种行为算不算我学习‘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失败!?如果我给别人吃了、使他不劳而获，这算不算对他进行腐蚀，是否就是膨胀了别人的‘私’字？我看最好的办法只有把桃树砍掉！

“我在美国报纸上当然也见到过舍己救人，甚至还见到舍己救‘猫’的新闻，但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特殊行为，不是反私、斗私的结果。其中未必不含有‘私’字的因素。

“由此可见，‘私’字无法改造、无法根除，因为，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私’字，而是‘私’字产生资本主义。其实，‘私’字不属于人的思想范畴，它属于人的以及一切动物的自我保护、自我求生，与生俱来的本性。

“解放后，我国十几亿人口为了‘思想改造’，亦即‘反

私运动’，所浪费掉的时间、财力、物力不可谓不多，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来看一看我们过去的这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何来今日的贪官污吏!

“但，合法合理的‘私’字必须用法律手段和道德规范来加以保护和约束；不合法的‘私’字决不允许它放任自流，侵犯他人的合法的‘私’字，祸国殃民。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通过合法手段而取得的财富值得鼓励，值得宣扬。如今，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属于无产阶级的亿万富翁的大名不是都光荣地出现在我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

“由此可见，‘私’字也确能促使人自觉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需要天天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为人民服务’的招牌、横匾或文章，但他们都在那里为人民服务得很好，并没有去学、去背。理由很简单：若是你不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不要你！人民不要你，你就走投无路，借贷无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

“我还认为，以往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在‘文革’中，所以能长期运行，其思想核心也仍然离不开一个‘私’字。‘四人帮’把人分成两大类，简言之，即左派和右派。他们的分水岭由他们的政治地位、言论以及出身的家庭来决定。左派的头上都戴着一种无形的光环。

“斗右派也是革命群众摘取这光环的一种重要手段。有了这

光影在身，他便变成了一种类似‘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至少可以过上人民‘内部’的平安日子。左派为了保持自己的‘进步’形象——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字——而斗右派；右派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直到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友。‘右派’为了不使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也是‘私’字——而只能在‘左派’面前俯首帖耳，笑脸相迎。每遇运动，个个都像犯人似的接受他们的斗争、训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9年，工人、农民和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文艺单位来领导我们。我那时感到很奇怪：我们虽是‘臭老九’但也认识字，能阅读毛主席著作，难道由他们嘴里念出来的毛主席的教导就特别有效吗！更何况，我们的队长常把字念错，在作大报告时，每隔几句话就会出现一个错字、白字或别字，例如把‘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字读成‘巧’字，把‘恬不知耻’念成舌不知耻’、把‘乌七八糟’念成‘鸟七八糟’……等等。我们第一次听不懂，后来听懂了，也不敢去纠正，更不敢笑。

“工人阶级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其咎非由自取，但不该请他们来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我相信不会有革命同志来就事论事地帮助我，只要他说一句我的学习‘态度’有问题，我就只能俯首帖耳了！

“更奇怪的是，每每在他们帮助我们‘交代问题’时，占

领文艺舞台的宣传队同志们总是启发、诱导、告诫我：‘你如不好好地交代问题，如何能对得起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和养育你的父母！’他并没有对我说，‘你如不好好地交代问题，如何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的工农兵、对得起雷锋、对得起王杰、对得起董存瑞、对得起刘胡兰、对得起江姐、对得起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对得起电影里的《琅玡山上五壮士》！因为他们也知道，爱人、孩子、父母是人们最不能割舍的亲人，用此‘私’字斗‘私’字才是最有效的。”

因为以后和父亲见面不易，我就“竹筒倒豆子”，把有关“私”与“公”的思想和盘托出，请他指教。我记得那时父亲默默无语地聆听我对他这句话的感想。最后他说了下面这段语重心长的话。

他说：“没有想到我这句话引出了你这么多的牢骚、这么多的郁郁愁闷！你说的都很对，都是事实，没有一句假话。你虽然不是学科学的，但你有科学的头脑，你的分析很有逻辑性，由表及里，很有说服力，很有深度，触及问题的核心，别人很难反驳，但不等于不能斗你。你应该知道，‘文革’中你愈是有理，你就愈要受到批判、斗争！他们只要把‘立场’这个法宝拿出来，你就全盘皆输了！

“你在思想上犯了一个特大的错误：那就是，你把‘文革’的政治宣言和政治口号当做真理来分析！你过于天真，不懂得政

治不是真理，政治只是管理和统治人民的方法、技巧和手段！任何当权派都暗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人民群众不可批评。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它出的，未必是真理，也常出假理，甚至还会出助纣为虐、杀人如麻！这是已被人类历史上无数政治事件所证实了的。人们都一怕苦、二怕死、三怕劳改、四怕斗，所以，无论它出的是什么‘理’，人民都只能听枪杆子的话，跟枪杆子走——它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它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指向何方，我们就走向何方。政权即由此而出。

“你在解放后是要求进步的：你在1950年参加了苏州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1951年参加了皖北的土改工作队，你来信告诉我，你亲眼见到农民的痛苦生活，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和光荣……但后来，如从改革开放往前算起，你回国四十年，就是因为你在1957年响应党的大鸣大放的号召写文章批评了毛主席亲自提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作曲家冼星海同志作品中的缺点，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因为这件事浪费在靠边站、挨斗、挨整、挨骂、当‘牛鬼蛇神’、坦白交代、下乡劳动、体验生活，以及各式各样的‘运动’、‘整风’和‘学习’之中！你的青、壮年的‘黄金时代’确是像钱塘江水那样地白白流去！我记得，改革开放后，1983年，你写了介绍西方的‘新音乐’的文章，又在大会上受到批判，因为你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

“我只能说，批评一位作者的作品，无论这作者的名气有

多么大，无论这批评是否正确，都是极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事，何必如此地对你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对你的遭遇我是十分同情的，这是你不懂政治，不是不懂音乐。

“我不懂音乐，但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音乐水平由于种种原因，还十分落后，没有出过被世界各国所承认的伟大作曲家。我们每每和外宾谈起中国音乐，总是把唐朝搬出来，但近代以来从来也没有人听过唐朝的音乐是个什么样儿的！你说那时的记谱不科学、不完善，它的音响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它的声音都听不见，你拿什么来证明唐朝的音乐是优秀的呢！？

“解放后，我们的文艺政策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是，轰动了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革命歌曲、歌剧、样板戏等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好像就不常听到了。曾被批判的德国贝多芬的‘无标题音乐’、法国德彪西的‘印象派’等等，又在电视里每日每夜地出笼了。我不是学音乐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否我们过去只要‘政治标准第一’，忘记了还有个‘艺术标准第二’呢！？

“我们至今还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过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这样的音乐巨人。这是事实，不是崇洋媚外。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绝不应实行鸵鸟政策。我懂得桥，我写过不少介绍中国的古代桥梁工程比外国的要早得多、先进得多的文章。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过我们的数学、物理学、文学（在

《桥话》中有大量的叙述）在古代就大放异彩，有很高的成就，为世界前驱。”

他以上这段触及我灵魂的话是他在医院里留给我的最后遗言。几天以后我去了美国。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的促膝长谈！

命运实在捉弄人，我1948年回国，四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把我带到了美国。美国是我的旧游之地。人之常情，我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去看了四十年前我住过的旧居，我惊奇地发现，这“旧”居——当然是经常受到修葺、保养——不仅不旧，反而新得几乎使我都相见不相识了。对比之下，我不能不回忆起我在杭州见到的父亲曾经住过的那处年久失修，断壁颓垣，真正破旧的“旧”居！

美国在这四十年中的变化当然是巨大的，我只能注意到有关改善普通人民生活的科技方面的成就，如电脑、电话、电视、通讯、出版业、汽车、飞机、邮轮、医疗、公路等等。它们大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增加了人的寿命。它们的出现难道不是“帮别人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的结果，不折不扣的“私”字的产物吗！？

但使我最惊奇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美国的同一城市中，我见到了过去曾经教导过我们用“三视”（蔑视、仇视、敌视）去批美、反美，帮助我和美帝国主义决裂的不少党的领导干部和

革命同志（有名有姓）和他们的家属，已经先我来到了美国。他们全家都移了民、定了居，也都在我美国住处附近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了儿子和孙子，拿到了养老金，过上了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生活。我们偶尔在马路上或餐馆里相遇时，他们见了我总是笑眯眯，羞答答，欲言又止；我也只能报以环顾左右，欲说还休，挥手告别避免尴尬。

天下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三十年对“人”的寿命来说，仍然是漫长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还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几十年来压在我心上的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的罪恶阴影总算从此烟消云散，离我远去。我又从几十年的“牛鬼蛇神”的称号下恢复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我怎能不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呢！我居然能在美国亲眼见到过去天天领导我们学习批修反美的老领导，我抚今追昔，如果这不是一场黄粱之梦，或南柯一梦，又是什么“梦”呢！？

来美后，我曾把这一亲眼目睹的怪现象在信上告诉了父亲，不意他在回信中竟把我批评了一顿。

下面是他给我最后一封信中写的一些话：

“……你的思想确实有些僵化。……‘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你的老领导有机会到美国去定居，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不值得你如此地大惊小怪！我看这对你也很有利，你今后

可以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杆子来做人：你可以说，‘你看，我过去的领导不是也在美国定居了吗！？……’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骂你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了！如今，你已退休，女儿也学有所成，得到了博士学位，不用你再操心，应可过上真正清闲的、无人打扰的日子。你有较全面的东、西方音乐的专业知识，你的中、英文水平也不低，你曾用这两国的文字写过、译过不少有关音乐的文章在上海和美国发表，你都寄给我看过，的确写得很好。正因为你写得有事实根据、有分析、用辩证的观点说理充分、无懈可击，所以别人才斗你、整你！……我是很同情你的。写了几篇文章（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反动’的地方），就应该受那么大的惩罚吗？当然，还有不少人受的苦比你更多，连生命都被苦掉了！

“你曾经告诉过我，大概是1979年，你单位来了个人，说已经为你平反了，你签了个字，就算万事大吉了。你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就这样不了了之，可以说是大题小做，大事小办，这也未免太潦草一点了吧。

“……你可把解放以来写的许多文章——我都看过它们，现在已不再是毒草了——收集起来出一本文集，我相信，音乐界的朋友一定会有兴趣一读的[①]。这些文章也可为你进一步地翻案，彻

① 这些文章的大部分已收集在2007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争鸣与共鸣》一书中。

底地洗刷强加在你身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好能在你长期挨斗的上海市出版，我们不是常常鼓励人们：‘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吗？！

“可喜的是，邓小平同志已经总结了‘文革’， 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开放，要我们向前看，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逝者已已，向后看没有用。（我记得在此我插了一段话：“我记得我第一天在我工作单位上班时，人事处一位干部要我写‘自传’——亦即向‘后’看。我就把我的以及父母兄弟姐妹的简历根据我的记忆所及，都写了进去，以示忠诚。我怕还不够，就把祖父当年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一事也不敢遗漏。不料这位干部对此颇感兴趣，要我回去把我和祖父的关系详细地写出来。我那时才十岁，不知道孙中山是谁，也不知秘书是什么东西，只是听家人说过而已。我看这是不折不扣地向后看！也许，这也属于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过去的向后看是正确的，现在的向前看也是正确的。这一‘后’一‘前’之间说明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因‘后’面已是无可挽回，‘前’面可能是朝霞万丈。”）

“对于你过去的挨整、挨批、挨斗，你也大可付之一笑，不必耿耿于怀。你大可以把你的‘思苦忆苦’变成‘忘苦迎甜’，你就会愉快许多。现在，我们都亲眼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后，仅仅十多年，除经济上有史无前例的长足发展外，文化教育也有飞速的进步。我国古今中外的各种专业书籍——科技、工农业、文艺作

品——的大量出版，直到各地的音乐厅、大歌剧院、交响乐队、大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都表示我们的国家确是又来了一次天翻地覆，再一次地换了人间。我还敢断言，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最长、最大、最现代化的大桥就要出现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

（果然，这座大桥在他离开我们短短的十几年以后就在杭州湾浮出水面了。请读一段报刊上的编者话："……大桥全长36公里，是国内特大桥梁之最……超过了美国切萨皮克海湾桥，和沙特阿拉伯的巴林道提桥，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你对中国音乐的现状是了解的。更重要的是，解放后你参加过中国音乐界的许许多多活动，有政治性的，也有学术性的，还'下'去体验过各式各样的工厂的、农村的'生活'。从世界范畴来看，参加过这些活动的音乐工作者实在为数不多。显而易见，你的经历是十分丰富的、可贵的。今后，不会再有人来要你交代问题、揭发问题、请你蹲隔离室，你的女儿也得了博士学位，无须你再操心。我还希望你做这件我认为很值得做的事：把你在这四十年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过的这段中国音乐的历程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中的一部分把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不掺杂个人情绪地写出来，作为你留给后人的遗产。只要是真实的历史，就必然会有人去写、去看，为什么你不去写呢！为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家的音乐大楼添砖添瓦， 将是你对中国音乐界的一份不小的贡献。这一砖一瓦上也必然会浮现出你的大名，成为'固

体’而留传后世。这也符合我的‘帮别人的忙（为别人提供中国音乐知识），就是帮自己的忙（为自己获得名和利）’的公式。焉有花了多年心血创造出的成果不署上自己的大名，不拿奖金或版税的！我还没有见过此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家！

“我说过，文章不是液体，更不是气体，它是固定不变的固体，可以长期地存在下去。只要你写得好，写得真实，即使现在不能出版，将来也会出版的。有这本书写，你今后的退休生活应该是充实而愉快的。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件为人民——当然离不开为自己——值得做的事。

“我没有什么财产，动的和不动的都没有，我能遗给你们的，只有我的一些言论和著作。我希望你、更鼓励你，在安静的夕阳下，妻女的陪伴旁，把你的音乐思想变成固体的文字，献给祖国人民。

父字，1988年国庆，北京医院”

这是他在医院病榻上的口述，由旁人代笔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只有“父字”二字是他的亲笔。父亲晚年目疾久治不愈，这写得歪歪斜斜的“父字”是他留给我的最后遗墨，它们再一次地使我忆起我们父子之间的多少陈年旧事、多少共同的命运和多少相濡以沫的亲情。

#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的时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在那时那地度过童年的时候。

那时，他工作非常繁忙。有时，我们虽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虽然一句只顶一句，但几乎句句有新意，我们都把它们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这钱塘江畔的家庭便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泡影。

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为了重温旧日儿时梦，我专程去拜访了它。我最想见到的当然是我生活过的旧居和父亲办过公的一幢大楼。幸而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开化路8号，我访问了几位老人才找到。

从大门外见到它坍塌的围墙时，我感到恍如隔世。我们征得房客的同意，入内参观。一进门，见到的是一切皆破，一切皆旧。整个房屋经过“文革”浩劫、违章搭建、年久失修，伤痕累累，千疮百孔。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草地上已堆满了简易房屋，住了多户人家，大人、孩子，人声嘈杂，十分拥挤，走廊上还挂着尿布，下面放着小马桶。这一景象令我惊愕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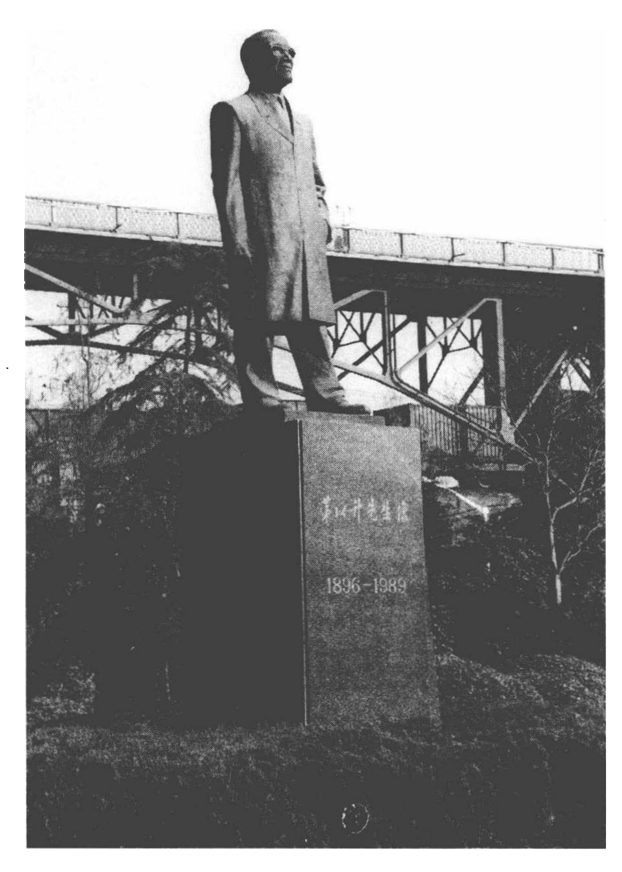
我也没有忘记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是建造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处小山冈上的大楼连旧址遗迹都已荡然无存了。

我站在这小山冈上，远处是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桥下是风帆点点，似梦非梦，似真非真。除了大桥健在外，我家往日的一切都早已随着这钱塘江水滔滔东流去，无影无踪。

七十年来，我去过地球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和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

滩……这些地方都不失为世界上少有的名城美景，但常使我萦怀在心、念念不忘的并不是它们，而仍然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地。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有同胞手足们的欢笑和梦想。它是我独一无二的故乡。

顿时，多少如烟的往事涌上心头。不由得我忆起周邦彦的这一诗句：“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钱塘江畔的茅以升铜像

# 后记

大桥建成后，不知有多少人，从这桥面上轻而易举地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江，到达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见到了他们想要见到的人。父亲做了为人民服务的功臣。

中国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除在钱塘江桥畔外，还在许多大学、单位里竖立了他的铜像。

他的名声不仅早已蜚声国内，也远扬海外：1982年，他87岁时，还亲自赴美，接受美国“全国工程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授予的外籍院士的称号，他是第一位获得该称号的科学家，他是海外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位华人科学家。

2006年4月15日，他的美国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又为父亲在校园内竖立了一座铜像，他是该校成立后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至此，他在国内、国外的铜

像共有六座。同年，中国发行了他的纪念邮票，还命名在他忌日那天新发现的一颗行星为“茅以升星”。

钱塘江水永不止息地从大桥的桥孔里流过，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你安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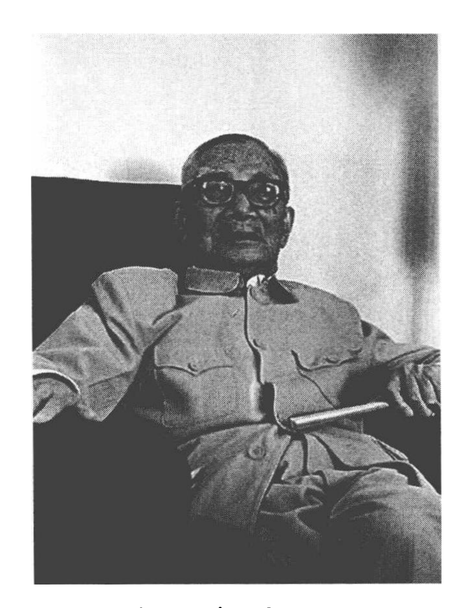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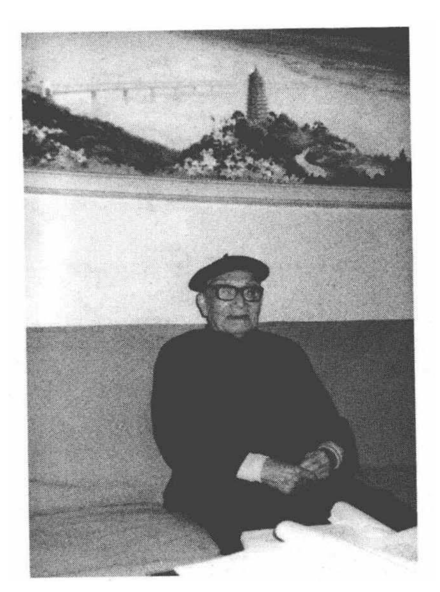
茅以升20世纪80年代于杭州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开工程学会会议



20世纪80年代的茅以升



1986年的茅以升



20世纪80年代作者与父亲于北京南沙沟寓中



茅于润夫妇与茅为蕙

# 附录一

## 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

常山龙

提起钱塘江大桥，人们都会想到茅以升。茅以升自己也曾在多年后回忆："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它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它也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而这座大桥经历的一段传奇，却是最令人难忘的。

20世纪30年代，正在兴建中的浙赣铁路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1934年，时任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

长的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这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钢铁大桥工程。之前，在中国的大川大河上，虽已有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可以想象，茅以升担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重任，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建造现代化大桥。

钱塘江又称钱江，地处入海口，潮水江流，汹涌澎湃，风波甚为险恶，其潮头壁立的钱江潮与随水流变迁无定的泥沙是建桥的两大难题。茅以升在造桥过程中，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曾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保证了大桥工程的进展。

至1937年，大桥快要竣工之际，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了！钱塘江大桥还未交付使用就先经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茅以升说，在"八一三"的第二天，即8月14日就有三架日军飞机来工地轰炸，当时他正在6号桥墩水下30公尺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一片黑暗，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这次日机轰炸是江、浙一带的第一次。

工程未完，战火已烧到了钱塘江边，此时江中的桥墩，还有一座未完工，墩上的两孔钢梁无法安装，在此后的40多天里，建桥的工人们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冒着敌人炸弹爆炸的

尘烟，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1937年9月26日清晨，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通过。在通车的当日，运送大批军火物资的列车就开始陆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了。

此后，上海的抗战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同年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教官在桥工处找到茅以升，向他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并简单地介绍了当前十分严峻的形势后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南京政府的文件上，要求炸毁钱江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南京来人还透露，炸桥所需炸药及爆炸器材已运来，就在外边的汽车上。

集两年半心血建成的大桥，铁路刚刚通车，就要自己亲手去炸毁它，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同工程技术人员商量和慎重考虑后，最后定下了炸桥方案。

当天晚上，所有的炸药就都安放到了南岸第二个桥墩内和五孔钢梁的杆件上，100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只等一声命令，就把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炸毁。

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大量难民拥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公路部分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装置了炸药，因此事是高度保密的。大桥公路的路面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竣工了，

只因怕敌机轰炸，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就有一二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渡江的船本来就不够用，不意在16日又因故沉没了一只，等待过江的人太多，加上战事更紧，形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当日，大桥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甚至连六和塔上也都站满了人。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感人。但有谁能知道，数百公斤炸药此时就安置在桥身上，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桥在落成之日，竟然就已面临着被炸毁的命运！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了。钱塘江大桥上南渡的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方面，上海和南京之间已不能通车，钱塘江大桥成了撤退的唯一通道，据当时的铁路局估计，22日这一天有300多台机车和超过2000节客货车通过大桥。

第二天，1937年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他站在桥头看着桥上黑压压拥过来的难民，心头涌起对日寇无比的愤怒。傍晚5时，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然隐隐可见，茅以升命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随着一声巨响，这条1453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这座历经了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部撤退，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一家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尽数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和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中的珍品，并为探明杭州市水文情况及建设钱江二桥节省了大量资金。这是后话。

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

至此，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事情。

# 附录二

## “我姓茅，茅以升的茅”

茅为蕙

每当有人问我：“你爷爷到底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在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时，爷爷就离开我们了，我对他的记忆一半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半是听别人介绍的。好在要想知道这么个有名的爷爷的丰功伟绩和卓越成就，不是件困难的事。

“爷爷”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始终就是“名人”或“伟人”的代名词。别人提起爷爷，会说到小时候爷爷带自己去钓鱼，去郊游，偷着给自己买零食的故事；我提起爷爷，会说到小时候爷爷带我坐着加长红旗轿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中学语文课本里

念爷爷写的“赵州桥”和在爷爷北京家里的后院里吵闹着要看爷爷警卫员佩带的手枪。我爷爷不是个一般的人，因此，我们祖孙的关系也不可能是一般。

知道爸爸准备写一本有关爷爷的回忆录时，我有些惊喜。惊，在于平日里其实爸爸很少提及爷爷，很少提起他和爷爷之间的故事，更是从来不用“茅以升的儿子”来向别人介绍自己。喜，在于爸爸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和最欣赏的作家，他的文如其人——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我知道，我将会从爸爸的笔下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爷爷，一个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平常人！要想了解茅以升的伟大很容易，要想知道茅以升的平凡，可能非这本小书莫属！

一直有人对我说：你的基因真好。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科学头脑，不懂得基因是何物，不过像这样的恭维和吹捧我还是喜欢听到的。我们茅家的基因固然不错，有博士学位的亲戚数不胜数，但更多的我想应归功于爷爷对我们小辈的教育。他直接的，或是间接的，用语言，或是行动，告诉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所选择的行业里做得出类拔萃！

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了一个电影童星，莫名其妙地出了点小名。爷爷当时很为能有我这么一个“小名人”的孙女感到高兴。稍长，又在钢琴上弹出了一点小名。当记者介绍我时，经常把“茅以升的孙女”放在“钢琴家”、“博士”、

“教授”或“国际比赛获奖者”的前面——不难想象，很多人还是认为茅以升的孙女要比再多的奖项或学历更加难得，更为有价值……

我有一个不一般的爷爷，不平凡的爸爸。和他们比，我的任何一点小成就都显得很一般，很平凡。做“茅以升的孙女”我没有经过任何努力，但我一辈子都会为做个合格的“茅以升的孙女”付出很多代价。爷爷的名气和爸爸的骨气都像钱塘江大桥的桥墩一样，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的琴声虽然是抽象的，短暂的，或是不起眼的，但也为钱塘江大桥这幅雄伟的画卷增添了一丝艺术色彩和诗情画意。

和爸爸一样，我很不喜欢、也不愿意向别人宣传我们是茅以升的后代。但我们俩都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我姓茅，茅以升的茅。”



2008年11月孙女茅为蕙在钱塘江管理局
成立100周年大会演奏钢琴曲

# 茅以升年表

许宏儒 郑淑涓 钱 凯

**1896年　乙未、丙申**

1月9日(农历11月25日)，茅以升，字唐臣，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五条街草巷。祖父茅谦生三子，父乃登、母韩石渠，叔乃封、乃经。兄以南。

10月，全家迁居南京钓鱼台。

**1897年　丁酉　2岁**

父补博士弟子员。

**1898年　戊戌　3岁**

随母识字。

**1899年　己亥　4岁**

识字渐多。

**1900年　庚子　5岁**

随兄入牛市贾治邦私塾，读《论语》。

**1901年　辛丑　6岁**

祖母病逝。

**1902年　壬寅　7岁**

祖父任《南洋官报》总编纂，父任《中外日报》南京通信记者。弟以新出生。乃封入学江南陆师学堂。

**1903年　癸卯　8岁**

迁内桥牙巷。入思益学堂。祖父创办养正学堂。二叔赴日入士官学校学陆军，乃经入学江南水师学堂。妹以纯出生。

**1904年　甲辰　9岁**

迁中正街。

**1905年　乙巳　10岁**

迁八条巷。父为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延揽，任一等书记官。端午秦淮河赛龙舟，观者挤坍文德桥，溺死多人，因而萌发建桥之愿。

**1906年　丙午　11岁**

考入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喜爱英文、数学两科，打下基础；假日从祖父读古文，过目能诵。

**1907年　丁未　12岁**

学堂课读严格，考绩常居八至十名。喜读《天演论》、

《新民丛报》，常临《玄秘塔》。闻徐锡麟、秋瑾遇难，悲愤激昂。

1908年　戊申　13岁

学堂令学生为慈禧、光绪每日行礼举哀，与同学裴荣剪辫子以抗议，被记大过。

1909年　己酉　14岁

激于爱国义愤，在“赎路”大会上认股百元，母未责备。兄在日加入同盟会。

1910年　庚戌　15岁

学校改名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升入高等预科。

1911年　辛亥　16岁

北上报考清华学堂，因误考期，改考唐山路矿学堂预科而被录取，成绩每列前茅。

10月，因武昌起义停课，南返。全家避居上海德丰北里，年底回宁。

11月，江浙联军组建于镇江，乃登任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乃封任参谋部次长，年底攻占南京，任南京宪兵总司令。

1912年　壬子　17岁

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先生欲效同学弃学从政，遭母严责；秋，听孙中山关于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之演说，选定桥梁专业，

专心攻读。

暑假中，与戴传蕙成婚，婚后返校。

**1913年　癸丑　18岁**

升入本科二年级。

**1914年　甲寅　19岁**

寒假游北京。

**1915年　乙卯　20岁**

见袁世凯称帝新闻，愤极，发誓再不看报。

长子于越出生。

**1916年　丙辰　21岁**

以四年成绩总平均名列第一毕业于唐校，考取清华留美研究生。

9月，赴康乃尔大学桥梁系，以特优考分引起校方重视，并决定：今后唐校学生来读可免试注册。

**1917年　丁巳　22岁**

获硕士学位。经贾柯贝教授介绍往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在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

**1918年　戊午　23岁**

至年底读满学分，准备博士论文。

任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副会长。

**1919年　己未　24岁**

10月，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通过，获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学位和斐蒂士金质奖章。

12月18日，登轮返国。

**1920年　庚申　25岁**

1月4日抵南京。任南京下关新惠民桥工程顾问。

8月，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

长女于美出生。

**1921年　辛酉　26岁**

4月，交通大学成立，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

次子于润出生。

**1922年　壬戌　27岁**

7月，辞职返宁，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

**1923年　癸亥　28岁**

5月，唐校学生罢课游行响应开滦煤矿罢工，交通部令开除全校师生。先生愤书声援文章，通过邵力子连日刊登于《民国日报》，形成南北舆论，交通部被迫收回成命。

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贾柯贝教授闻先生任东大工科主任，将其珍藏的全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学术会刊连精美书橱运赠给东大工科。

12月，东大主要建筑“口字房”焚毁，先生任复校委员会主委，募款建新校舍。

为中国工程学会总会董事部成员。

次女于璋出生。

**1924年　甲子　29岁**

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三女出生，为纪念东大，取名于东，后改于冬。

**1925年　乙丑　30岁**

交通总长叶恭绰送函坚邀，赴京任交通部技正兼育才科副科长。

**1926年　丙寅　31岁**

2月，任唐山大学校长，处理唐校风潮后，辞职回部。

7月，兼路政司考工科副科长。

8月，任中国工程学会筹委会主任。为南洋大学30周年校庆撰写《工程教育之研究》。

四女于燕出生。

**1927年　丁卯　32岁**

2月起应校长刘振华约，往北洋大学代课，后受聘专任教授。

**1928年　戊辰　33岁**

研究共线图。

5月，因停课全家南返，过沪在邹秉文家中晤孔祥熙，约任财政部工业司帮办。

8月，应邀视察黄河铁桥，研究修复方案。

12月，就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

1929年　己巳　34岁

3月，第二工学院教学大楼起火尽毁，先生争取“中比庚款”十万元以重建。

应邀赴杭为北洋校友作报告，晤见曾养甫。

1930年　庚午　35岁

2月，劝专职教授们勿去外地兼课，致遭攻击，南下向教育部辞职。

回镇江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

1931年　辛未　36岁

7月，淮河涨水，8月31日忽起大风，高宝段倒堤30多处，先生与建设厅长孙揆伯皆引咎去职。

1932年　壬申　37岁

1月，应邀主持天津大陆银行实业部。

2月，家眷到津，居福兆里。应邀去北洋工学院兼课。

8月，受聘专任教授，辞大陆银行职。协助筹办中国工程师学会天津年会。

1933年　癸酉　38岁

3月，应约赴杭，与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面谈兴建钱塘江桥事。8月，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10月，写成钱塘江建桥计划书。应宋子文邀，以助建桥经费为条件，暂兼全国经

济委员会水利处长，拨款救济苏北灾区。

**1934年　甲戌　39岁**

1月，“全经会”通过补助桥工经费一百万元。“行政院”长汪兆铭委派先生赴津整理北方水利机关。

2月，携眷返宁奔父丧。

春初，建桥借到二百万元，任钱塘江桥工程处长，请罗英为总工程师，11月11日举行开工典礼。6至8月主编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期刊《桥渡专号》上下册。

**1935年　乙亥　40岁**

3月，钱塘江桥正式施工，辞海河工程处长及水利处长二职。

**1936年　丙子　41岁**

催齐全部桥款，忙于桥工，母以“唐臣修桥如唐僧取经过八十一难乃成”相激励。中国工程师学会8月在杭年会，推为筹委会主委，《工程》特出《钱塘江桥工程》专刊。

**1937年　丁丑　42岁**

7月，抗日战争起，钱塘江桥日夜赶工。

8月14日，敌机空袭大桥，正率众在南号墩水下30米沉箱内工作。

9月26日，铁路通车。

11月17日公路通车，届此，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并监造的公铁两用双层现代化大桥建成。因敌逼近。

12月23日将桥炸断。

铁道部命先生为工务司帮办，赴粤汉、京汉等线巡视，制定抢修桥梁方案。

**1938年　戊寅　43岁**

3月，任内迁湘潭之唐山工学院院长。

5月，率院迁湘西杨家滩。

6月，接交通部令赴贵州盘江桥研究炸后修复事。长沙大火后，决定唐院迁贵州平越。

**1939年　己卯　44岁**

迁院平越，借房复课。

**1940年　庚辰　45岁**

3月，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议。

5月，筹办高中，平越人士大悦。

11月，为母七旬寿，与兄、弟捐基金两千元，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

**1941年　辛巳　46岁**

2月，赴渝出席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会议。

8月，应曾养甫约，为筹备滇缅铁路赴仰光会商。

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授先生名誉奖章以表彰钱塘江桥建成劳绩。兼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长。

**1942年　壬午　47岁**

学校因原唐、京两院之争，改名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先生去职，赴贵阳专任桥梁设计工程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

**1943年　癸未　48岁**

3月，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4月，中国桥梁公司由交通部及中国、交通两银行合资成立，先生任总经理。

5月，出席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陈立夫劝各委员加入国民党，先生未理。

为建缆车以利重庆交通，牵头筹建缆车公司，任总经理数月。

**1944年　甲申　49岁**

兼任全国水利委员会常委，受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秋，日军犯黔，交大贵州分校徙渝，先生与在渝校友全力协助在壁山丁家坳复课。

11月，任交通部各路保送赴美实习人员甄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1945年　乙酉　50岁**

1月，以"一周之报，报之一周"为旨，与交通印刷公司经理王镂冰创办《报报》。

11月，为筹建重庆两江大桥见"行政院"长宋子文，宋允支持并请设计审核黄河堵口工程，先生为"行政院"参议。

**1946年　丙戌　51岁**

1月，母逝，纽约、华盛顿报纸为此发新闻。"行政院"为利

用美援，组织工程计划团，委侯家源及先生为正副团长，先生筹划桥梁公司内迁，不问工程团事。

4月，权桂云来归。

6月，创办中桥上海分公司，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长，荐汪胡桢任副局长，唐振绪为总工程师。

教育部任命先生为北洋大学校长，因筹划中桥迁沪并成立重庆分公司，屡辞不允，任命金间洙为代校长。

**1947年　丁亥　52岁**

4月，应杜镇远约赴汉口协商武汉长江大桥事、赴广州察办西南大桥修复事。

6月，教育部因上海交大学生民主运动拟开除学生90余人，请先生任校长解决学潮，先生组织校务整理委员会，仅停12名学生一学期课。

9月，北访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及京津诸亲友。

12月，辞北洋大学校长职。

**1948年　戊子　53岁**

2月，赴港、穗洽谈西南大桥借款、签约事。

7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8月，赴台北主持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开幕典礼。

**1949年　54岁**

5月2日，上海市政府任命先生为秘书长，先生坚拒，避入中

美医院。中共地下党组织希望先生出任以配合解放上海，保护工厂和营救被捕学生。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对先生说：“我知道，你对上海解放，是有贡献的。”

9月，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受毛主席接见和周总理宴请。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0月，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

五女玉麟出生。

**1950年　55岁**

5月，应教育部约视察东北教育。

8月，任全国科联委员、全国科普副主席。

9月，兼铁道技术研究所长。“五一”、“十一”均上天安门观礼台。

**1951年　56岁**

元旦，参加中南海勤政殿团拜、聚餐，与毛主席同席并请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

1月，率专家工作团赴大连对原伪满铁路研究所调研。

3月，出国参加世界科协大会，会后参观捷克、苏联并赴瑞士看长子于越。

**1952年　57岁**

元旦，参加勤政殿团拜、聚餐，并亲聆毛主席谈“三反”运动。

5月，专任铁道技术研究所长。

8月，加入九三学社。

12月，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

**1953年　58岁**

春，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9月，去怀仁堂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出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

10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三次赴朝慰问团赴朝，11月返京。兄以南病逝于沪。迁居地安门织染局。

**1954年　59岁**

4月，主持铁研所行政工作会议，提出"一切为研究，研究为运输"的口号。

6月，任北京市科联主任委员。

9月，以江苏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

10月，率全国科普代表团访苏。

12月，以委员身份出席二届全国政协。

**1955年　60岁**

2月，任铁道部武汉长江大桥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视察桥址。

6月，率中科院学部委员东北视察团赴东北视察。

7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

11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科院代表团访日，在东京学术报告会讲“中国新建设”，在土木工程学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均介绍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归国在杭受毛主席接见，汇报钱塘江桥兴建经过并共进晚餐。任中科院奖金委员会委员。

**1956年　61岁**

1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向毛主席介绍科技组各委员。

2月，出席九三学社“一大”，当选中央常委、科文工委主任。

3月，出席周总理到会的科学规划会议，任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

4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赴意大利、瑞士、法国访问。

6月，赴葡萄牙参加国际桥梁协会第五次会议。于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

7月，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9月，应邀旁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为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会长。

“十一”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晚携眷属上天安门参加晚会，见到毛主席。

出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二大，连任理事长。

**1957年　62岁**

2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亲聆毛主席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

“五一”参加游园会，晚携眷登天安门城楼。主持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之盛大联欢晚会，周总理作“来去自由，不分先后”的讲话，各副总理及各部长到会。出席中科院学部委员二次全会并提出“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

6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并作“反右”发言。

8月，赴伦敦参加第四次国际土力学会议，作《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基础》、《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报告。

“十一”上天安门观礼。

赴武汉参加大桥通车典礼。

12月，为全国总工会八大作科普工作报告。

1958年　63岁

2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率铁道部慰问团赴鲁、沪、赣农村工厂慰问铁道系统下放干部。

4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向党“交心”运动。先生向党提建议143条。

5月中旬，铁科院批判先生“名位思想”，先生向全院干部检讨三次。

9月，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2月，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科文委主任。

**1959年　64岁**

任人民大会堂结构专家组召集人，将审查报告签名呈周总理。

3月，与周培源等视察苏北，4月过镇江下榻镇江地委招待所，欢晤镇江负责同志。

是月，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连任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三届政协委员及科技组长。

出席人民大会堂9月28日国庆十周年大会、9月30日国宴，“十一”上午赴天安门城楼东二检阅台，晚携眷登天安门城楼，三外孙均幸与毛主席、赫鲁晓夫握手。

**1960年　65岁**

2月，为中共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班作新力学报告。

4月，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及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作《业余教育中的技术革新》发言。

5月，出席中科院学部委员三次全会，作《自力更生，独立创造》发言。主持全国政协文教组与科技组联合召开的座谈会。

6月，出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三大，连任理事长。赴瑞典出席第六届国际桥梁会议。

8月，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全会，受毛主席接见并合影。

9月，参加中国代表团赴苏，参加苏联各地庆祝中国国庆活动。

11月，偕戴传蕙夫人出席苏使馆“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1961年 66岁**

3月，钱学森代表中国力学会来商讨先生所提出的力学中基本概念事。

4月、6月，两度开会讨论。

4月，出席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并作报告。

5月，代表九三学社赴沪向上海各民主党派代表讲话。

8月，参加中科院《科学工作四十条》初稿讨论。二叔二婶相继逝世。

**1962年 67岁**

1月，率人大、政协视察团赴福建。参观洛阳桥、江东桥、五里桥等著名古桥。

2月，赴广州出席国家科委与中科院联合召开的商定十年科学规划的会议。

3月，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及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

**1963年 68岁**

2月，出席国家科委十年科学规划会议，为土木组召集人。

2月，《桥话》在《人民日报》连载。3月，出席全国农业科技会议，与毛主席合影时毛主席说：“你写的《桥话》我都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

3月，应文化部约，参观赵州桥，王冶秋、梁思成同行。

7月，出席人大常委会科教文讨论会，发言《建议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被印发，受周总理、叶圣陶好评。任北京科协主席。

10月，视察西北。

**1964年　69岁**

1月，出席国家科委各专业组长、各部主管科技副部长联席会议。

6月，赴沪探罗英病，罗以《中国石拱桥》未竟稿相托。

8月，出席有亚非拉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12月，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当选常委；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

所撰《石拱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1965年　70岁**

8月，赴广州出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四大”，连任理事长。

10月，参加全国政协参观学习队赴川。

**1966年　71岁**

7月，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8月18日，上天安门城楼。8月，遭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红卫兵”揪斗，会后挂牌游院。“十一”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1月，出席孙中山诞生百年纪念会。

**1967年　72岁**

1月，戴传蕙夫人病逝。

4月，权桂云夫人入主家务。

11月，视察卢沟桥。全年频繁接待外调。

**1968年　73岁**

全年频繁接待外调。

**1969年　74岁**

全年频繁接待外调。

**1970年　75岁**

研究纸质图表计算器成功。经三年努力与夏承栋、陆师善合作编成《桥话》资料九册。全年频繁接待外调。

**1971年　76岁**

撰写《征途三忆》。7月，《忆人篇·齐眉回忆》毕，9月，《忆地篇·留美回忆》、《忆时篇·童年回忆》毕，凡14万字。

**1972年　77岁**

全年频繁接待外调。

**1973年　78岁**

5月，应日中土木技术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土木工程代表团赴日访问。

**1974年　79岁**

研究桥梁振动问题。

**1975年　80岁**

9月，携珍藏近40年之钱塘江桥资料赴杭赠浙江省档案馆。

10月，权桂云夫人病逝。

**1976年　81岁**

7月，因唐山地震波及京津，夜宿车中致感冒转急性肺炎，8月，入北京医院急救。

9月，率团赴东京出席国际桥梁结构会议。

12月，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三次会议。

**1977年　82岁**

2月，迁居三里河南沙沟。

**1978年　83岁**

2月，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为中央电视台向世界介绍的七位科学家之一。

4月，任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小组成员。

7月，出席北京市科普工作会议并讲话。

12月，主持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临时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中国桥梁史》第一次编务会召开。先生任主编。

**1979年　84岁**

主持北京市科协历次会议并作报告。在人民大会堂等处为少儿作科学报告15次，听众2万余。6月，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

6月，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

10月，出席九三学社全国三大，当选六届中央副主席。

12月，当选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首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　85岁**

3月，出席中国科协二大，当选副主席并致词。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方毅、吕正操、严济慈、钱三强、郭维城等出席的庆祝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建院30周年茶话会，并在庆祝大会上作《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三十周年》报告。

6月，出席北京市科协二大，作工作报告并当选二届北京市科协主席。

8月，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

**1981年　86岁**

主持北京市科协历次会议。先生所撰《没有不能造的桥》获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号召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

11月，出席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

**1982年　87岁**

1月，主持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座谈会。

4月，联合首都103位科学家倡议制订《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

道德规范》。

7月，美驻华使馆为华罗庚、茅以升分获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举行招待会。

9月，列席中共十二大。

10月，赴美出席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18届年会,接受所颁外籍院士徽标。

11月，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1983年　88岁**

1月，视力严重衰退。4月赴广州就医。

赴沪出席上海交大校友总会成立大会，当选名誉会长。以主席团成员赴沪出席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并为颁奖人之一。

12月，出席九三学社四大，当选七届九三中央副主席。

6月，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1984年　89岁**

4月，赴镇江出席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卷编委会成立会，看望镇江二中师生并合影，去草巷寻根。

5月，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

8月，主编《现代工程师手册》脱稿。

12月，出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四届理事会，致词并任名誉理

事长。以先生为首六位科学家发出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建立青少年基金的呼吁，迅得响应。

**1985年 90岁**

视察九江大桥。

3月，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5月，视察运行近50年的钱塘江大桥，就另建第二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欣任镇江市沈括纪念活动顾问并为沈括故居题写“梦溪园”门额。

**1986年 91岁**

1月，中国科协、铁科院、北京科协联合举行庆贺茅以升从事科教工作65周年暨90寿辰大会，周培源主持，邓颖超、康克清赠花篮，方毅到会讲话。

5月，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代表团。

6月，出席中国科协三大，发言并任名誉主席。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会长莫扎至北京，将该会荣誉会员证书授予先生。

9月，主持九三中央纪念建社41周年座谈会。出席北京科协三大，作工作报告并任名誉主席。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出版，翌年获中国图书荣誉奖。

**1987年 92岁**

7月，出席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会。

8月，出席铁科院三届院务委员会成立会，任名誉主任。

9月，赴杭出席纪念钱塘江大桥通车50周年座谈会并与当年建桥工程师登桥合影。赴镇江与家乡人民共度中秋、国庆并祭扫祖坟。游扬州瘦西湖。

10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14日，因病入院。

**1988年　93岁**

1月9日，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送生日花篮、蛋糕，全国政协、九三中央、全国科协领导到医院贺寿。

春节前夕，李鹏总理到院探望。

11月，被推举为九三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主席。

**1989年　94岁**

年初，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诸口昭一特来京邀先生出席本州—四国跨海桥通车典礼，因病未能成行。

11月12日，在京病逝。

11月27日，江泽民、李鹏、万里、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向先生遗体告别并送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各部委以及江苏省镇江市均送了花圈；首都各大报在头版报道，《人民政协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刊登先生生平及悼念文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的父亲茅以升
作者=茅于润著
页数=176
SS号=12943995
DX号=
出版日期=2011.09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附录二“ 我姓茅，茅以升的茅 ”（茅为蕙）
茅以升年表（许宏儒郑淑涓钱凯）